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俄 國 史

(五)

佛 那 次 基 著

周 新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史 國 俄

(五)

著基次那佛
譯 新 周

著 名 界 世 譯 漢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史 國 俄
册 五
History of Russia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徐

原 著 者
George Vernadsky

譯 述 者
周 新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鄭光昭)

◆ 頁六八五

第十七章 蘇維埃政府之經濟政策

內戰的終結，就使蘇維埃政府可以全力應付於對內的事件。主要的問題就是牠的經濟政策。一九二〇年，蘇維埃政府劃一了，自從革命後在經濟方面所宣布的措置，並且加以修正，使之合於新的要求。於是造成了一種完全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雖然它的名稱叫做「戰時共產主義」(War Communism)，但它實是在內戰終結之後纔完成的。這個制度，建築在完全否認私有財產和其他資本家或資產階級經濟原則的基礎之上。蘇維埃政府想完全統制生產，因此全體的商業機構以及貨幣交換，信用與銀行，就都歸無用了。

政府最初佔有了工業。十一月革命後，所有大規模的工業都集中在牠的手中。工業的國有漸

漸的就遍及於小機械店。一九二〇年，發布了一個命令，把所有雇傭五個工人以上和利用機械力的工業收歸國有。（註一）更小的工業宣告為歸政府所統制。這包括所有農民的手工業。

在佔有工業之後，蘇維埃政府就開始把同樣的手段應用於農業方面。牠把農民視為一個經營政府所有土地的工人，而非一個土地的所有主。所有他的生產，都視為政府的財產，應由政府用物品繳納的方式所占有。（註二）農民自己祇留下了足敷他一家需要的數量，外加一些來年耕種所必須要的種子。

整個國家的生產就這樣的由政府開拓着，同時由政府把生產的製造品供給人民。這種物品的分配，顯然是不取費的。這種辦法同樣的適用於如薪炭、機械那樣的原物以及個人所用的物品。後者是根據在先決定的比率，由一種日糧卡片分配着。這種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就使商業不再需要了，於是在一九一八年就正式廢除了商業。銀行也不需要了，就同樣的收歸為國有。一九一八年創辦了一個『人民銀行』（People's Bank）。這名義上是一個銀行，事實上卻是財政委員會的一分部。根據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九日的通告，人民銀行就和另一個財政委員會的機關合併，成為

「豫算會計部。」

貨幣並沒有廢除，但實際上，因為紙幣的發行，就成為全無價值了。一九一七年三月一日，流通着的紙幣計有一一、七八六、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至十一月一日，這個總數加了一倍。一九一八年一月，它達到了二七、三一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兩年以後，一九二〇年一月一日，總數為二五、〇一四、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翌年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達一、一六八、五九六、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一八年初，美金一元約值九盧布；一九一九年初，便值八十盧布；在一九二〇年初，值一、二〇〇盧布。貨幣值的跌落，就使物價增高。一九一九年，物價的一般指數比一九一三年高了三倍。一九一八年，比一九一三年高出了二三·五倍，一九二〇年高出了二、四二〇倍，在一九二一年竟達一六、八〇〇倍。

新社會主義經濟，在破壞了商業與貨幣交換複雜機敏的組織之後，就不得不設立一個龐大的官僚政治的組織，處理貨物的生產和分配。在這種組織之首是國家最高經濟會議（Supreme Council of National Economy）局勢的困難不但在於有待發展一個新的經濟的組織，並且還

須爲整個經濟機構創立一種新的心理動機。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破壞了自然的動力和個人的企業心。需要與供給之間失去了連鎖。貨物的市價，已不再視貨品的價值而定，而視消費者之屬於那一類人物而定。因爲工作的動機已經破壞，蘇維埃政府就不得不採取強迫工作的原則。它頒布於一九一八年，在一九二〇年一月的普遍勞動法令中最後加以肯定，它不僅應用在工廠，並且也適用於農業方面。

這個法令，實際重新創立了亞歷山大第二改革以前存在於俄羅斯的國家經濟。蘇俄現在全體的人民實在就等於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上半的農民以及分派在各工廠裏的工人。蘇俄的每一個國民，同樣的被分派於某一家工廠或某一塊土地，沒有特殊的准許，就不能變動。此外，在蘇俄許多工業裏採用了勞動軍事化的原則，例如煤礦業。一九二〇年曾企圖組織一種武裝工人的公社，與亞歷山大第一的軍事屯墾區極其相似，在遣散「紅軍」之時，有人就提議把軍隊單位改作特殊勞動的工作單位，如伐木，建築公共屋宇，以及修理農業器具等。

佃奴經濟的特徵是少量生產，這在一九一八——二〇年社會主義經濟中就完全的表現了出來。一九二〇年，棉織工業每人全年的產額，爲一九一二年產額的百分之二二，在煤礦業爲百分之十五。把生產量減少完全推因於社會主義經濟，自然是不準確的。精神的渙散，和戰後的疲憊，以及工廠的一般的跌價，都有相當的影響。但根本的原由，卻是社會主義制度，在這一制度之下，工人就失去了對他勞動生產力的興趣。

工業生產每年的在低落。在一九二〇年爲一九一三年總額的百分之二三·二。（註三）運輸的物品也減少了。在一九一六年，每天的車載總計爲三一、一六四輛；一九二〇年總計爲一〇、七三八輛。工業生產的低落和運輸的紊亂，就使國家變得窮貧困了。例如在歐戰之前，每人的糖與糖蜜的消費額爲四·八七金盧布，至一九二〇年就跌落到〇·二四金盧布了。戰前每人消費的織物計值六·七七金盧布，一九二〇年就跌落到了〇·九一金盧布。

農業生產的低落，表示出一個更嚴重的情形。革命給與了農民所有可耕種的土地。由於大產業的占有，農民所有的土地增加了百分之三一。但是同時，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取消了所有耕種土地的刺激。農民除了他自己所需要者外，人們不再有任何希望去增加生產了。結果，即為耕種地的減少。一九一六年，在後來蘇維埃國家境土之內，耕種土地的面積是八六、〇〇〇、〇〇〇俄畝，至一九二一年，就減至五四、〇〇〇、〇〇〇俄畝了。並且生產效率較高的大產業的破壞結果就使農業生產格外的低落。穀物的收穫量甚之比耕地面積的跌落還快。一九一六年收穫總計為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波特。一九一九年據估計為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即一三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民平均每人十五波特，包括着下種的穀粒。這是差不多一個可致餓死的比例。牲畜的飼養也因為蘇維埃政府的經濟政策而發生極大的降落。一九一六年，俄羅斯有馬三一、〇〇〇、〇〇〇頭，一九二〇年祇有二四、〇〇〇、〇〇〇頭了。一九一六年的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頭的牛在一九二〇年減至不到三七、〇〇〇、〇〇〇頭。

就因為俄羅斯是在一個貧困的狀況中，所以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二一年的旱災就引起了可

怖的飢饉。一九二〇年所收穫的穀物僅及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波特。一九二一年，整個東南部俄羅斯都沒有收成。第二年差不多有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民在饑餓的狀態中，同時，有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在半饑餓的狀態中。由一九二一——二二年飢饉所損失的生命，從各方面的估計自五百萬至九百萬不等，即差不多等於歐戰中所犧牲的總數。如果沒有得到外來的救濟——主要的是從美國——生命的損失將更要浩大。賑災的主要組織是由胡佛 (Herbert Hoover) 領袖的美國賑濟會 (American Relief Administration) 和其他賑濟會也援救着智識階級的分⼦，他們的狀態要不然就十分的無望了。它所施濟的總數計六一、五六六、二三一·五三元，貨物的供給爲七一八、七七〇噸。一九二二年八月，它在俄羅斯每天施食的人數達：兒童四、一七三、三三九人，成人六、三一六、九五八人，每天的總數爲一〇、四九〇、二九七人。除食物之外，它還用船載了由美國紅十字會和美國軍隊所捐助藥物，分配給予災民，總計值八、〇七二、二五六·〇三元。(註四)

三

社會主義政體在俄羅斯人民中引起了極大的不滿，這在一九二〇——二一年的連續的農民暴動中表現出來，其中最重要的是由安湯諾夫 (Antonov) 所領導在當波佛省所發生的一次。政府用極殘忍的手段把他們鎮平了，最後，於一九二一年二月末，喀郎斯塔得在『赤色』海軍水兵中發生了一次叛亂。叛徒的主要要求是召集立憲會議，和重申商業的自由。這一次他們原是以前布爾塞維克革命中的主要的臂助，所以他們的叛亂在蘇維埃當局看來，是一個不祥的朕兆。喀郎斯塔得的叛亂不久就由武力鎮平了；但是看到局勢的嚴重，列寧就決定在警察的方策以外，改變政策，平服一般的不滿。列寧就像他在過去一九〇六年對於國會選舉問題一樣，又預備把他的政策作一劇烈的轉變。只要他能夠保持其權力，他準備對現實作任何必要的妥協。列寧在一九二一年三月時說，『我們是在這樣的一個貧困，崩頹，和農工生產力涸竭的境況中，所以就該拋開了一切去增加生產。』(註五) 這樣就產生了所謂的 N.E.P. 新經濟政策。

新經濟政策之初，對於農民是一個激烈的改革，徵收實物的方法改成了徵稅。最初，這種稅是以實物繳納的，主要的是穀物；其後就改爲用貨幣繳納。改革的目標，在於重新培植農民耕種土地的熱心。蘇維埃政府准許農民，政府祇取他們勞力生產的一定的比率，作爲賦稅，並不把他們即時所需以外的剩餘，全數沒收。農民得到了自由處置剩餘產物的權利——即可以在公共市場中售賣。因爲這個緣故，以賦稅代替實物徵收的法令就不能免的重採取了商業的自由。一九二一年七月，在割取收穫之前，就通告了商業的自由。（註六）

農業的解放與同時，工業方面也開始了同樣的措施。一種『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的制度替代了社會主義式的生產。一種『托辣斯』（trusts）制度替代了單一的工業統制。國家仍掌管着大規模的生產，但小規模的生產一部分交給了私人。這個讓步的制度，是爲了想利用外國的資本。免費供給工廠以原料和器物終止了；每一家工廠，不論是政府所有的或私人所有的，所用的每一件東西都得付費。這邏輯地就使重新採用了貨幣，恢復了它正常的經濟的功能，重採用了銀行與信用制度。一九二一年末，創設了以營業爲方針的國家銀行。

在貨物生產方面社會主義制度之撤消，附隨以貨物分配方面的社會主義原則的放棄。免費領貨的權利，限於紅軍的兵士和紅色海軍的水兵，警隊的隊員，以及牢獄中的囚犯。經濟的復興同樣的就廢止了強迫勞動。

四

新經濟政策對於俄羅斯經濟上有一個極有利的影響。農業和工業的生產都開始增長了。耕地的面積，一九二一年跌落到五千四百萬俄畝，在一九二二年至四千九百萬俄畝，至一九二三年升至五千九百萬俄畝，至一九二七年差不多就達於一九一六年的水平（八千三百萬俄畝）一九二四年所收集的穀物達二五、〇〇〇、〇〇〇波特。而在一九二六年超過了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波特。漸漸的，家畜的數量也增加了，在一九二六年馬的匹數量超過了二千七百萬，牛的頭數超經了五千五百萬。有幾種工業的生產也增加了，煤油的生產，在一九二二——二三年跌落到一一、五〇〇、〇〇〇噸的，在一九二五——二六年增至二四、五〇〇、〇〇〇噸；棉織物的生產

從一九二二——二三年的五六〇、〇〇〇、〇〇〇米突增加至一九二五——二六年的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米突。

俄羅斯的經濟復興就使通貨的改組和確立一個固定的本位幣成爲可能。一九二一年重組了的國家銀行，在一九二二年得到了發行柴夫奈茲(червонets)鈔票之權。一柴夫奈茲等於十個金盧布或美金五元。(註七)柴夫奈茲的準備金其四分之一是金，白金或是固定的外國貨幣，其餘的都可以即刻調換的短期債務保證。柴夫奈茲發行時，舊有的貨幣並未收回。國庫依舊鑄印舊紙幣，因之在一個時期內就流通着兩種紙幣，一種是固定的，另一種是不斷地在跌價。柴夫奈茲與金磅和金元的交換比價規定了一個柴夫奈茲值一九二三年的一一七紙盧布，每一個一九二三年的紙盧布值任何以前所發行的一、〇〇〇、〇〇〇紙盧布。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每一柴夫奈茲值一三、七〇〇『一九二三年紙盧布』在一九二四年四月便值五〇〇、〇〇〇『一九二三年紙盧布』。

一九二四年春，國庫得到了發行值一盧布三盧布五盧布的小貨幣之權。國家銀行宣告承認

新幣無限償付所有的債務，其比率爲每柴夫奈茲值十盧布。於是就停止了舊紙幣的印行，鑄行銀與銅的通貨。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七日宣告購買舊「一九二三年的盧布」其比率爲每一金盧布值五萬「一九二三年的盧布」。通行舊錢幣的最後一天宣布爲一九二四年五月十日，收回的最後一天爲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因之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就祇有固定的柴夫奈茲和金屬的錢幣在市場流通了。

五

新經濟政策的採用，最初似乎表示開始的完全回復了資本主義經濟。但蘇維埃政府用了非常的力量避免了牠。一九二二年三月，第十一次共產黨大會就宣告「經濟前線的退卻」必須終止。但其後在下諾弗哥羅特地方的恢復年市集和重行採取生產交易所，仍繼續對新經濟政策讓步。至一九二二末「退卻」纔確實的終止。從這個時候起俄羅斯所通行的經濟制度，既不是完全社會主義的，也不是完全資本主義的，而是介於兩者之間的性質。現在的蘇維埃制度，由於新經濟

政策的改革，與社會主義的制度有別，政府在經濟事件中過分的統制，尤其是對外貿易，又使之與資本主義的制度劃然有別。

蘇俄的政府經濟之發達，可以由下列的數項來表明。一九二三——二四年間，政府工業生產按照戰前價格總計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而私有工業的生產，包括對外國的讓與，其值僅及八四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即為生產總數的三分之一。政府工業的比重一年一年的增加一九二五——二六年，國家工業生產達五、三三三、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同時私有工業的生產為一、二五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即為生產總數的四分之一。國家依舊保持對外貿易的獨佔。蘇維埃政府想統制國家的經濟生活，為此目的起見，生產的進行，往往數年前便設計定當。這是由 Gosplan（國家設計委員會）所執行。

蘇維埃政府關於農業的政策，（註八）包括提高生產力和盡可能的挫抑農民私人家族的發展。在新經濟政策之後，並沒隨着重申個別小農的所有權。根據一九二二年的土地法，所有的土地屬於國家，農民僅能自由的利用。土地法的第二十七款絕對的禁止土地的售賣、購買、抵押、遺傳、或

是餽贈。團體或個人都可以耕種土地。蘇維埃政府並不擁護舊有農村公社，但是牠也不像司徒列賓立法那樣的鼓勵着農民離開公社，成爲一個單獨的租戶。設使農民脫離了農村公社單獨的在一塊土地上工作，個人經濟是不能獨立的，祇能成立一個家族經濟。家長管理着這一家的所有物。如果家族內分子希望的話，地方執行委員會就可以把家庭中另一人接替家長的地位。

以前農村公社所占的反對農民個人主義的地位，現在已爲合作運動所取代了。蘇維埃的合作社，是在新經濟政策之後纔產生的。以前在戰時共產主義的時期，蘇維埃政府企圖遏制所有各種形式的合作組織，斥爲資產階級偏見的表现。農業合作由一九二一年五月七日的命令所改組。由同年八月十六日的命令，承認合作社擁有財產之權，承認合作社爲國家的基構。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共有三三、五〇〇處農業合作社，從事於製造乳油、乳餅、磨麵粉等等，共有社員五、九四八、七六〇人。

蘇維埃的合作社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合作社，僅名目相同。牠們是由政府所管轄，故具半官的性質。合作社的高級管理權在共產黨員的掌握中，他們根據着黨的願望而領導合作社。（註九）合

作社是蘇維埃政府統制和領導農民經濟活動的一種工具。政府希望由合作的運動來完成統一所有農民的單獨家庭生活。共產黨領袖的主張，以爲合作社必可農民中的社會主義的訓練。它們應當幫助使各農民個別家族之間的差別歸於平等。他們更應當抵抗着較富家族的發生。由此，蘇維埃領袖就宣布了一個農業合作，社會主義的政策。

蘇維埃政府農業的政策的效果，減少了各個農民家族之間的差別，使農民經濟趨於一種平均度。沒有土地耕種的農民家族的百分率從百分之一·四（一九一七年）降到了百分之六·七（一九二二年），有耕地四俄畝以上的農家的百分率從百分之二九·五（一九一七年）跌至百分之一四·七（一九二二年）。有中等產業的農民，耕種的土地不滿四俄畝的，從百分之五九·一（一九一七年）增至百分之七八·六（一九二二年）。後者的一種農民家族，其穀物僅足以供給自己，很少有剩餘在公共市場銷售。供給市場的生產的家族是較大的家族，它們的數量已有極大的減少。根據較低的平均數，強迫農民家族的平等化，嚴重地阻礙了俄羅斯農業生產力的增加。

六

一九一八——二〇年的戰時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制度，可以比之於十七世紀及十九世紀中葉間俄羅斯的佃奴經濟，而現代蘇維埃的工業經濟可以比之於懷德伯爵所提倡的較低級的形式，蘇維埃農業經濟可比之於司徒列賓改革前的俄羅斯帝國的舊有體制。(註一)由極大的努力，在許多種工業中，俄羅斯達到了一九一三年的生產額，在若干工業部門還略略超過了一九一三年的生產額。例如，在現今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領土範圍之內，農業生產值在一九一三年總計一二、七九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在一九二七年，總數達一二、七七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工業生產值在一九一三年是六、三九一、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而在一九二七年達六、六〇八、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註二)煤的產量在一九一三年為二千九百萬米突噸，在一九二七年為三千萬米突噸。煤油產量在一九一三年為九百萬米突噸，在一九二七年達一千萬米突噸。棉布產量在一九一三年為二、二三八、〇〇〇、〇〇〇米突，在一九二七年達二、三四二、〇

○○、○○○米突。

政府開始建築許多新的工廠，其中如聶伯河上的一個價值八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水力站（註二三）和自北部高加索的格洛耐（Grozny）通至黑海塔潑斯（Tuapse）埠的一條煤油管線。

完成於一九三〇年的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亞（Turkistan-Siberia）鐵道，也是應該注意的。這些事實，似乎證明一九一八——二〇年災亂後蘇維埃經濟的大進步。但要對於蘇維埃經濟的前途有準確的看法，不僅須與歐戰前俄羅斯的生產相比而且也須比較假定繼續歐戰前程而不經革命所可能有的情形纔可得到。在戰後的歐洲主要國家以及美國，許多工業部門的生產力，都超過了戰前的紀錄。

同時，俄羅斯的生產充其量而言，僅僅超過了歐戰前的水準。因為這不但須考慮俄羅斯經濟的總生產力，而且也得考慮每個公民的生產力。一九一三年在現今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的領土以內的人口爲一三五、〇〇〇、〇〇〇人，一九二八年一月，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的

人口近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如果國家總生產還依舊近乎以前的水準，從人口的增加而論，人民平均的生產力便實際降低了。

蘇維埃經濟的一個主要的特徵，即工業的發展是以農業為犧牲的。一九二六——二七年的蘇維埃豫算表，有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專用於國家的工業。自從那時起對工業的津貼年有所增。因之蘇維埃工業是由國家負擔所培育的，這就是說，以農民為犧牲。在這一方面，也許可以看出工業勞工的境遇較優於農民。工人的物質情形也許差等於歐戰之前。根據蘇維埃官家的報告，一九二七年俄羅斯工人的每月平均收入為六四、三六盧布，而在一九一三年平均每月收入則為二五盧布。不過一九一三年盧布的購買力較之一九二七年的大得許多。有些農產品以及製造品的零售價格增加了百分之二百至三百。因此，工人工資的實際購買力並沒有增加；在另一方面，在大城裏百分之七十的俄羅斯工人的居住狀況，也許現在比革命以前要好些。工作時間也減短了。在一九二七年工作時間平均為七·五小時，而在一九一三卻須十小時。

蘇維埃國家的工人比起農民來居於特權的地位。俄羅斯農民的生活程度顯然比革命前低

了。在一九二五年，他所購的茶糖平均僅及一九一三年所購的百分之二十八，所購的布僅及百分之四十，鹽僅及百分之六十，肥皂僅及百分之八十，火油僅及百分之九十。

蘇維埃工業物價的增高，較之主要農產物的物價爲快。一九二七年末，織物生產的批發價格的指數，比一九一三年增加了一倍；同時，小麥指數價格僅增加了百分之一，麥僅增加了百分之十。因之，農民以穀物交換時，他祇能得到一九一三年所得到的貨物總數的一半。並且農民的工作時間顯然並沒減少。他們在夏天工作就像以前一樣的從日出到日入。在蘇維埃工廠裏，所採行的七小時工作制是以俄羅斯農民每天作十二至十四小時工作爲代價的。

(註一) 或不用機械力而有十個以上工人的工場。

(註二) 參看前面第十五章第三節及第十六章第一節。

(註三) 根據歐戰前的物價，一九二〇年俄羅斯工業生產值爲八三五、八〇〇、〇〇〇金盧布，而一九一三年爲六、三九一、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

(註四) 這個數目包括在前述賑濟費用總計以內。

(註五) 第十次共產黨大會中演辭。

(註六) 這祇限於國內商業。對外貿易仍為政府所獨占。

(註七) 盧布含有一七·四二四杜耶(dolyas)的純金。每杜耶等於〇·六八五七六格蘭姆。

(註八) 除了貨幣的改革是於一九二四年終結的。一九二五年實行了些利於農民的措置，但在一九二七又撤廢了。

看第二十章第二及第十一節。

(註九) 關於共產黨的部分，參看後面第十八章。

(註一〇) 祇有很少幾點司徒列賓的改革為蘇維埃立法所接受。

(註一一) 上列的數字，根據蘇維埃正式的報告。其正確之程度若何，無從知道。

(註一二) 有位美國的機械師庫柏(Hugh L. Cooper)被僱監督和設計這個工程。

第十八章 蘇維埃俄羅斯政治之結構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布爾塞維克革命，曾以集中權力歸於蘇維埃作為牠的口號。這個目的，就決定了俄羅斯新政治結構的一般的特質。在布爾塞維克革命時所舉行的第二次全俄蘇維埃大會核准了新的權力擔負，起了在二星期後選出的立憲會議的職務，但我們已經知道立憲會議在第一次的會議後就給布爾塞維克所解散了。在第二次全俄蘇維埃會議中，也確認了列寧所領袖的人民委員會的政府。

但這個新政府並不急於要規定俄羅斯的政治結構。最初有許多急待解決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鞏固牠的地位，和與中歐列強訂結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約。直至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

的第十五次蘇維埃大會纔採用了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 (Russian Socialist Federative Soviet Republic 簡書 R. S. F. S. R.) 的憲法。

這時蘇維埃的領土，理論上擴張及於所有由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約俄羅斯所保持着的土地。但事實上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時歸屬俄羅斯的土地面積僅等於十六世紀莫斯科王國的範圍。(註一) 直至一九二〇年，後纔漸漸的達到了現在的範圍。

根據一九一八年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憲法，俄羅斯的政治結構，建築在蘇維埃會議制度之上。最高的權力機關是全俄蘇維埃會議。會議在必要時便可舉行，但每年至少須舉行一次。蘇維埃會議是一個大而複雜的組織，它不能比之於立憲國家的國會，不是全國選民會議的一種替代。會議的決議可以比之於一種國民的普遍的複決。(註二) 蘇維埃會議選出一個中央執行委員會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它會議停開期間是最高權力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包括三百餘人，可以相比之於國會。它舉行會議，委員有和國會代表一樣的不可侵犯權。不得委員會主席團或委員會主席准許不能加以逮捕。祇有經過委員會或委員會主席的認可纔能加以審訊。

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停會期間，蘇維埃國家的最高權在理論上是屬主席團。但實際上，人民委員會主席團有更大的重要性。人民委員會是蘇維埃國家的內閣。在最初，事實上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的唯一機關。在一九一七年末及一九一八年上半年，以人民委員會的名義頒佈了些重要的法律。這些包括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五日頒佈的關於紅軍組織的法律和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七日頒佈的關於土地的法律。在一九一七年與一九二一年之間，以人民委員會名義頒佈的法令共有一、六一五條，而以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頒佈的，卻祇有三七五條。

與歐美立憲國家不同的，蘇維埃政府最高部門之間的憲法權力沒有明確的區別。繼代的原則有澈底的實施。中央執行委員會在蘇維埃會議閉會期間具有與蘇維埃會議完全相同的立法和行政權。牠的主席團在執行委員會停會期間，就是最高的立法與行政機關，在必要時人民委員會也可以擔任了最高的權力。

二

蘇維埃會議——蘇維埃國家的最高權力——是依照一種具某種特徵的方法所選出的。第一，蘇維埃的投票權是不普遍的。下列的幾種人都被剝奪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一）凡雇傭工人以獲得利潤爲目的者；（二）凡賴資本利息所得，商業所得，各種產業所得而營生者；（三）私人經商者以及商業之居間人；（四）一切教派之和尚及教士；（五）前警察及皇族中人。最後一種人的被否認有選舉權，也許可由當時的政治鬭爭來說明，而且顯然是暫時性的，但對於前四種人的限制，和共產主義的政府是有特別關係的。列入這幾種人中的數目，雖不很多，尤其是因爲革命和內戰蹂躪的結果，但所重要的，這樣一來就將國家經濟及道德生活的領袖，排出了政治活動之外。

但蘇維埃選舉制度的特點並不限於這些限制。蘇維埃的投票權是既不普遍又不平等的。蘇維埃會議包括兩種團體，其一是城市蘇維埃的代表——即工人的代表，其比率爲二萬五千選民得選代表一人；其二是省蘇維埃會議（Provincial Soviet Congresses）的代表——即工人和農民的代表，其比率爲十二萬五千居民得選代表一人。根據憲法，省蘇維埃會議更包括：一、縣蘇

維埃的代表，其比率爲二千選民選出代表一人；二、農民會議（Volost）的代表，其比率爲一萬居民得代表一人。這樣工人所得到的代表數，就要比農民所得的代表數高出一倍多。最初，他們在單獨的團體中投票，得到了較其餘人民多二倍又半的代表。（註三）第二次工人和農民一同投票，但他們的代表依舊又多於農民二倍半。由事實觀察，工人投票兩次，即保證了他們可以得到比農民更多的代表，雖然農民佔了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七，而工人尚不及百分之十三。

並且選舉權並不是直接的，例如城市人民代表之達到蘇維埃會議之前須經過二個階級，農村人民代表都須經過四個階級。（註四）

最後，蘇維埃俄羅斯並沒有秘密的投票。一切選舉都是公開地用舉手表示，並且必須有選舉委員會及地方蘇維埃的代表蒞場。這樣，蘇維埃政府就很容易以藉牠的機關之手去操縱選舉的機構。操縱的結果是可驚的：在蘇維埃政府制度的低等階段中，我們看到共產黨所占的比率很小，但政府的最高系統中情形便完全不同了。一九二二年，在村蘇維埃中祇有百分之六·一爲共產黨黨員，其餘被列爲『非黨員。』在農民會議中共產黨的代表佔百分之一一·七。在縣會議中百

分之五四·四的代表爲共產黨黨員。在省會議中百分之七八·八的代表是共產黨黨員。在全俄羅斯蘇維埃會議中則有百分之九四·九的代表爲共產黨黨員。

三

不論蘇維埃政府的選舉制度優劣如何，要明瞭俄羅斯現代的蘇維埃制度的真實特性，是不能在這些技術性的事件中見到的。更重要的，乃在於它的虛飾的性質。蘇維埃組織的複雜制度，祇是一個掩藏俄羅斯真正的統治者——共產黨的一種煙幕。

共產黨在蘇維埃國家的地位，不能與立憲國家的政黨的地位相比。共產黨並不是國內的許多黨中的一黨，而是國內唯一的政黨。（註五）蘇維埃國家的政體，是共產黨的一種獨裁。從這個意義，它近於一種專制政府甚於一種立憲的政府，這個事實解釋了蘇維埃國家最高權的幾個機關爲什麼措置不至於互相抵觸。（註六）所有這些機關都平等表現着單一的威權——共產黨——的意志。共產黨，蘇維埃國家的真正的統治階級，在這一方面，就好比與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初葉

的貴族相同。一切蘇維埃政府最重要的策略，都只是共產黨的決議的反映。所以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最初先由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批准，而後再由第五次蘇維埃大會毫不更改的接受。新經濟政策開始時以徵稅替代實物徵收（註七）最初是在一九二一年三月由該黨的第十次會議決定的，然後付之第八次蘇維埃大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

共產黨是一個嚴密的集權的組織，由鐵的紀律所團結，它的中央委員會和政治部皆由共產黨大會所選出，但在大會停會期間，所有黨員皆須絕對服高級當局（註八）統治者羣確實可以準備和操縱全黨大會的決議。在這一團體中，有一個人握有獨裁的權力。列寧拿着這非正式的地位，直到一九二四年他的逝世止，而現在就由斯達林所占據。

若要加入共產黨，必須以候補者的資格，經過一個試驗的時期。現今黨員及候補黨員的人數共有一、二〇〇、〇〇〇人。黨員生活於黨機構的嚴密監守之下。黨是時常舉行『清黨』的，用以把非其所欲的黨員斥除。

共產黨的黨員在日常的生活中有許多的特權，但他們的生命卻並不是屬於他們自己的。他

不能拒絕奉行黨所需要他們服務的事件，這種事件是隨牠的意願交付給他的，無論是行政，宣傳或軍務的工作。多數的共產黨黨員是屬於勞動階級的，在一九二七年爲百分之五十八。農民僅佔全黨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四，而官吏佔百分之十七。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有二十五萬共產黨員屬於農村的黨的組織的有七十五萬或約總數的四分之三是屬於城市的黨的組織。共產黨不祇是有共同政治興味的個人的團體，黨員之間也有一種共同的社會哲學，差不多可以說是一種共同的宗教，作爲維繫。

就那些由學說的激動，並非由於個人利益打算的共產黨員而論，共產主義是代替了宗教，支配了他們整個的人生。共產黨不僅想確立政治上的理想。牠想確立一個完全新的社會。它是偏執而狂熱的，所以共產黨就和其他宗教和教會——尤其是基督教信仰作不斷的鬭爭。

四

共產黨的勢力，不但在蘇維埃最高權力的組織中表現，並且也在地方政府裏表現出來。在理

論上，地方政府處於蘇維埃的手裏。每村和每縣的居民選出他們的蘇維埃。地方蘇維埃分別出席農民會議，縣、省蘇維埃會議。每個蘇維埃和蘇維埃會議選出一個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就是地方的統治團體。中央政府並不正式遣派代表去管理執行委員會的工作；因之在理論上，蘇維埃政府似乎就鼓勵着人民的自治。事實卻並不如此。第一，蘇維埃失掉了他的全權。他們逐漸的減少了集會次數。由一九一八年的憲法，地方蘇維埃會議（省）每年至少須集會四次，而農民會議每月至少集會一次。憲法的要求卻並沒有實現；而最後法律就確定地方蘇維埃祇須集會一次，於是它就這樣的失去了直接統治地方事務之權。由一九一九年十二月第七次全俄羅斯蘇維埃大會的宣言，牠們就成爲了『宣傳和報告的機關』。最初，由執行委員會擔負了地方蘇維埃會議的權力。它們不祇是實行大會意志的機關。且有否決大會議案和通過他們自己立法的獨立權。因爲地方蘇維埃會議的削弱，縣和村蘇維埃也都失去了權力。

在大縣城裏，蘇維埃的人員達到一千人，在列寧格勒以及莫斯科甚且超過此數。並且所有工會和其他工人組織，都可以參加蘇維埃集會，有建議之權。蘇維埃在這些情形之下，就嫌過於龐

大，失去了處理所有有待執行工作的能力。

根據憲法，縣蘇維埃每星期集會一次，但不久這個規定就不再實行，集會改成爲每月一次。市蘇維埃是認爲附屬於縣和省蘇維埃會議的。因之，市蘇維埃就沒有它們的執行委員會，在大會閉會期間，權力即授予縣和省執行委員會。因之蘇維埃俄羅斯的地方自治，就確實的從地方蘇維埃和蘇維埃會議的手中，轉移到了執行委員會的掌握，但事實不止乎此，正如實在權力之從蘇維埃會議轉移至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的權力又移轉至了委員會的主席團——由省蘇維埃會議的會員七人，和縣蘇維埃會議的會員三人所組成。同時，主席團很快的轉變成爲中央政府的省的機關；所謂中央政府，最後分析就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席團和人民委員會蘇維埃。

各地方執行委員會及其主席團，都必須服從高級執行委員會的命令；這樣鄉的執行委員會就必須服從省執行委員會，反之各高級執行委員會都可以否決低級執行委員會的議案。一個省的執行委員會可以否決鄉委員會的議案；高級政府的主席團對於低級執行委員會的人員可以給予訓誡的措施。這樣整個地方政府的制度就爲中央集權了。地方的人民，由牠的選舉方法，祇供

給政府以爲官衙服務的候補人選。在蘇維埃之下自治祇是理論的。實際上卻是一種高度的中央集權的政府。

在這兩種權力之間的顯然的衝突，是由第三種權力所解決，那就是共產黨的秘密政治機構。共產黨具有與一切政府的省、郡、縣、市、村蘇維埃相應的地方委員會。因爲黨的嚴格的集權和紀律，所以可以寄託地方黨委員會以實現中央黨機關的意旨。地方黨委員會以共產黨候補員當選入地方執行委員會和主席團，由此它就可以統制地方機關的工作，和支配着蘇維埃及蘇維埃大會的選舉。

五

蘇維埃國家從最初開始便自行宣告爲聯邦國家。事實上它是爲了適應帝國崩解後在俄國所出現的離心勢力，根據蘇維埃的憲法，許多地方須受了極大的自決的自由。這些就是所謂的自治共和國。（註九）其他的地方得到了較小度的獨立，這些就是所謂自治區域。（註一〇）其實，這種地

方劃成各省的蘇維埃主要領土並沒有什麼差別。（註一）直至一九二三年建立了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聯邦（Union of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s 縮稱 U. S. S. R.）以後，這種自治區域的重要性纔因為他們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院中有了代表這一個事實而增加了。

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是在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約所留與的俄羅斯的領土內成立的，即烏克蘭不在其內，但當德國歐戰失敗之後，烏克蘭獨立的問題又開始了。內戰之中，烏克蘭從一方面轉至另一方面，最後在鄧尼金失敗之後，為蘇維埃軍隊所佔領。蘇維埃政府祇形式上承認烏克蘭共和國的分立，烏克蘭蘇維埃大會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九日通過了烏克蘭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烏克蘭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的最後組織於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完成。同時又建立了一個白俄羅斯共和國。這個新共和國的憲法，在一九一九年二月四日由白俄羅斯蘇維埃大會所通過。牠是在一九二〇年八月波蘭戰爭之中實際組織成的。無疑這是因為需要吸引白俄羅斯對蘇維埃目標的同情而組成的。

在一九二〇——二一年的進程中，在阿塞爾拜然（Azerbaijan）、亞美尼亞和喬治亞也組

成了社會主義共和國。(註二)同時，蘇維埃政府基華及不花刺訂結了一個條約。這條約承認了不花刺和花刺子模（基華）爲獨立共和國。這些新組織就引起了蘇維埃國家政治結構的紊亂。因此之故，在一九二二年末，各別蘇維埃共和國之間的關係經過了一番改革，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六日就通過了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的新憲法。

一九二八年末，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包括有下列各部：(一)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二)烏克蘭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三)白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四)外高加索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五)月卽別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土庫門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 (Turkoman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俄羅斯及外高加索都是聯邦，其餘的都是單一的國家。外高加索聯邦共和國是於一九二四年把分立的諸外高加索共和國併合而成的。月卽別及土庫門共和國都是在一九二四年組成，代替外裏海區和花拉子模不花刺共和國。

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聯邦的組織，使蘇維埃國家政治結構的改變成爲必要。聯盟的六個重要共和國都有一個和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相似的政府組織。每個共和國裏都

有一個蘇維埃大會議，一個中央委員會，以及一個人民委員會蘇維埃。但在現今聯邦的最高權力機關是全俄蘇維埃會議。全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權力差不多近於以前全俄羅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權力。它現在分成兩院：全聯邦蘇維埃和各民族蘇維埃。全聯邦蘇維埃包括人數約四百人，代表聯邦各共和國，依各共和國人口比例而選出。各民族蘇維埃包括的是社會主義共和國及自治區的代表（其比率為每國或每區五人）和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自治區的代表（其比率為每區一人）。

全聯邦人民委員會蘇維埃祇包括聯邦各委員會的領袖。這包括外交、陸軍及海軍、商業、交通、郵電、勞工、財政、國家經濟最高會議，以及工農監查。蘇維埃的聯邦制度和歐美聯邦制的不同，就像蘇維埃議會主義與相當的西歐及美國的民主制度之不同一樣。蘇維埃的聯邦主義是特殊的，一種，以同盟共和國為基礎，仍舊貫徹着無產階級獨裁的原則，而無產階級的獨裁實際上就是共產黨的獨裁。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建立之後，俄羅斯的共產黨就成為「全聯邦的共產黨。」但即在這次名稱改變之後，共產黨還繼續着是中央集權的，因此之故，蘇維埃聯邦纔並不像他表面

上那麼的散漫。共產黨是各個個別蘇維埃的統一勢力。差不多在所有聯邦的各個的共和國裏，共產黨內的俄羅斯黨員的比例皆多於共和國的本地人，這是很可以注意的。雖然如此蘇維埃聯邦主義，不像議會主義的那樣的牽強附會。在俄羅斯廣大領土內地方的愛本土心力量是太強了。地方的愛本土心就供給了蘇維埃聯邦制的一個堅實的基礎。不論俄羅斯將來的政治結構是怎樣，俄羅斯的聯邦制似乎不致消滅，相反祇有更加發展。

六

與大部分現代憲法相反，蘇維埃憲法並不贊成公民平等及個人自由的原則。在蘇維埃法律裏，階級差別的原則代替了平等的原則。社會分成了「工人」及「非工人」兩種。（註一三）這種原則在戰時共產主義的按人民類別分配食料中，已以最拙陋的方式應用實行過。社會的分成各階級，在戰時共產主義終結之後仍當保存着。在前面已經看到，「非工人」被剝奪了政治的權利。工人並且有其他的特權，例如，蘇維埃法庭是傾向於減輕，有時就中止對無產階級出身的工人的

刑罰，即在他們受普通刑事控訴時也是如此。並且工人和他們的孩子有受高等教育的優先權，更爲了他們的利益組織了特殊的工人學會。但是工人和非工人都被剝奪了個人及家庭的不可侵犯的自由權，直至新經濟政策以後，他們纔得到了一個有限制的保護他們私人財產的權利。蘇維埃政府授權與牠的機關——尤其是非常委員會（赤卡）可以不用任何命令手續逮捕或執行處死公民。新經濟政策之後，赤卡解散了，在一九二二年代以一個所謂 G. P. D. 的機關。但這只是名稱的更改而已。G. P. D. 的官吏有不用特殊的拘票而逮捕所有的犯罪的反革命派，盜賊，以及私販者的權利。其他的逮捕，由 G. P. D. 的最高機關全權執行。在理論上，被逮捕者在他監禁的兩個月中必須審判或則釋放，但由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特殊的認可，可以准許把囚犯作更久的「隔離」。

家庭的穩固，在一個長時期內是爲蘇維埃政府所否認的。政府及黨的當局有權可以把人民強迫逐出住所，易以其他的居住者。（註一四）一九二二年頒布了一條命令，宣告祇有由法庭的命令纔有權執行把居戶逐出他的居所，但這條命令並沒有阻止人民在覺得他人所佔的地方太寬大

時而強暴侵入他人住所的行爲。在「戰時共產主義」的時期裏，私有財產——不動產與動產都任憑政府機關的意思而歸爲國有，由國家徵用，以及沒收，毋需開列任何的帳表或負責任。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人民委員蘇維埃的明令，承認懲治性的徵收財產的原則，准許法庭及行政機關，採用這種的懲罰方式。

在蘇維埃國家內是沒有出版自由的。由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一切出版書報的工具都交付給「工人階級及貧農」，實際上就是入於共產黨及蘇維埃政府的手中。所有私人的出版物，在一九一八年秋都加以禁止了。由新經濟政策，蘇維埃政府不得准許了私人出版，但須受極嚴格的檢查。含有鼓勵反對蘇維埃政府的作品，以虛偽的敘述激動公衆輿論或刺激宗教或國家主義的狂信的作品，概受禁止。每種印刷品都須有檢查官批准的符號。祇有共產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中央委員會和共產黨地方委員會的出版物，國家印刷所的出版物，機關報、新聞報（Izvestia）以及科學院的科學論文，不必受檢查。

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承認公民集會的自由，並且還供給工人及農民

以適當的集會場所。但實際上除非得到了共產黨或政府的准可，即不能舉行公衆的集會。甚之，即科學團體的集會也須先得政府的明白的准許。同樣在召集任何會議之前，不論是地方的抑或國家的，必須得到有關的政府官吏的許可。

除了共產黨，蘇維埃國家不准有其他的政黨，結社或同盟的存在。由一九二二年的命令所確認，但須得內政委員的准可。

信仰的自由在蘇維埃國家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在共產黨的目光中，『宗教是人民的麻醉劑』。因此之故，蘇維埃政府就想限制教會的活動，給予反對教會的宗教宣傳以任何可能的利便。唯物論就是共產主義國家的宗教。在理論上，蘇維埃國家的教會是和政府分立的事實上教會是受壓迫的。牠被剝奪了法定的權利。它並不被認爲是一個法人，因此它就不能擁有財產。所有教會的財產——這就是說，主要的是國教教會——是在一九一八年被蘇維埃政府沒收了。地方蘇維埃有權把教堂建築給予『教派』，但這些『教派』享受教會產業的權利，是可以廢止的。教會高級組織，不論是中央的或地方的，蘇維埃法律都不予承認，加以禁止。（註一五）教士列爲非工人

的階級裏，而且更剝奪了各種特殊的權利，例如教士不得在學校有任何的地位，或任何與公衆教育，司法部，農業部，糧食供給有關的職位，或參加合作社的活動。

這樣，蘇維埃政府祇讓給公民很有限的權利。但即使這些權利，在宣布戰時或被圍狀態時仍可被侵奪。一九二三年三月八日頒布了一個關於防衛革命的非常措置的法令。(註一六)這個法令含有一八八〇年反動時期帝國立法的最惡劣的因質。根據一九二三年的法令，對於發生反革命或人民反對政府的合法措施時，得採取非常的手段。某一地域成爲軍事活動之區，以及發生在「非常的情勢」普通規律不足以防衛革命時，得宣布戒嚴狀態。一九二三年的法令絕未限制政府官吏宣告非常或軍事狀態的權力。當有關的政府的官吏認爲有採用非常措施的必要時，事實上即當共產黨領袖看到有必須的時候，即實際採行。

(註一) 參看第十六章第五節。

(註二) 蘇維埃制度和立憲國相似之處祇是表面和矯揉造作的。前者在下面便可看到，並不是一個憲政制度者。

(註三) 在蘇維埃制度中，一個『選民』(elector)差不多等於一個『居民』(inhabitants)

(註四) 從鄉村至農民會議，從農民會議至省間接制度，和一八〇九年斯柏倫斯基的制度相似。參看第九章。

(註五) 應該注意共產黨員的總數不過全國成年人民總數的百分之二。

(註六) 參看前面第一節。

(註七) 參看前面第十七章第三節。

(註八) 關於共產黨內的反對派參看後面第二十章。

(註九) 例如巴士克啓耳基茲韃靼克里米亞以及其他共計十一處。

(註一〇) 在一九二八年初共有十二個伏爾加的德國公社是一個重要的自治區，直至它後來成爲一個自治共和國。

(註一一) 國家的分爲省(Gubernias)保留着帝國的情形僅稍有變動。

(註一二) 參看後面第十九章第三節。

(註一三) 根據共產黨的主義「非工人」包括在蘇俄外各國所認爲生產的階級如實業家及商人。

(註一四) 工會會員有佔據城市中心最優美的屋宇作爲住所之權。

(註一五) 實際上各種不同教會的組織選繼續存在；國教教會的地位最爲惡劣，但在一九二七年，受了非正式的承認。

(註一六) 蘇維埃政府成立的第一年這個關於「非常手段」的命令是不需要的，因爲其時整個狀態是被認爲「非

常的」。

第十九章 迄一九二四年蘇俄之對外政策

一

蘇維埃俄羅斯的對外和對內政策都由共產黨所支配。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聯邦正式的代表，事實並不是俄羅斯的代表而是共產黨的代表。當共產黨在蘇俄領土之內，是一個單純的中央集權的政治團體，同時在國際事件上，俄羅斯共產黨僅是第三國際政治組織的組成部分的一分子。

第三國際就是有組織的國際共產黨，以莫斯科爲大本營。共產國際的組織，直至歐戰結束後纔成功。布爾塞維克利用歐戰的最後幾月，在俄羅斯的俘囚中散布共產主義的宣傳。在戰爭結束之後，他們就立即進行組織第三國際。它的第一次會議的通告，由列寧和托洛斯基在一九一九年

一月二十四日發表。(註一)第三國際第一次會議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在莫斯科舉行，它頒布了一篇冗長的給全世界勞工的宣言。各部的部長也選出來了。它的活動的第一時期，是以在俄羅斯以外所有的國家中煽動共產主義的革命為特徵。革命事實上在匈牙利和巴威發生了，但不久就被鎮壓下去。(註二)在英美也計劃革命的煽動。

戰後革命運動的失敗，布爾塞維克在外國就創始了一個有系統的宣傳綱領。在一九二〇年七月第三國際的第二次會議後，就採取了一個新的計劃。第三國際以其在莫斯科的大本營，指揮着全世界共產主義的宣傳，爲了便利起見，全世界就劃成了幾個特殊的宣傳區，歐洲劃成了六區。化用於『世紀革命』的宣傳的費用是很大的，但是不能準確的計算出。由一九二三年共產國際的豫算不下於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牠的用意在於成爲一個可能的蘇維埃世界政府，但目下牠祇是俄羅斯蘇維埃的一個附屬品。就理論說，莫斯科成了共產世界的中心。

共產黨盡力的擴張在亞洲民族中的宣傳。共產黨與蘇維埃政府的領袖開始狂熱地活動，爲亞洲民族訓練革命的領袖。亞洲民族對於在東方擁有經濟和政治的特權的歐洲人怨忿，日漸加

深，準備聽受這一種的號召。布爾塞維克煽動者的革命的呼籲，最初在亞洲得到了極大的成功，但因為共產黨的過分的堅執共產主義以及對於所有宗教的猛烈反對，終於受到了極大的阻礙。在一九二〇年九月於巴庫舉行的東方民族會議中，回教教義的勢力證明倒要比共產主義為強。齊諾維夫（G. E. Zinoviev）的反對宗教的演辭，引起了回教徒的忿怒。

不論在中東，在近東，在波斯或是在土耳其，其社會的現狀是適合於採用共產主義的。俄羅斯的革命時已經表現出來，共產主義最受工人和一些智識分子的歡迎。在波斯或土耳其，卻沒有產業工人，智識階級的人數也很少。

英國深怕着共產主義在印度的宣傳，印度人民強烈的宗教情感成了反對共產觀念增長的一個堅固的障礙。中國的情形稍有不同，在那裏俄國共產主義的勢力要比在波斯或土耳其大些。許多的中國智識階級以及一部分的勞工階級都接受了共產主義。中國國民黨的左翼也表示同情於共產主義。中國共產黨組成了，加入了共產國際的組織。（註三）

二

除了世界革命的國際問題外，共產黨還有特種的國家問題，主要的是保護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聯邦的領土。共產主義在理論上否認純粹國家問題的存在，同時，實際政治的需要使俄國共產黨擁護着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的統一，正像他們不得不承認聯邦內民族的權利一樣。共產黨領袖用籲求防衛所謂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祖國」(socialist fatherland)的方式，來掩蔽他們的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祖國」的口號最初是由托洛斯基在一九一八年初俄德議和談判中所宣布的。它並沒有阻止共產黨和德意志訂結了一個不幸的和約——其中的一條就把烏克蘭分離了俄羅斯。(註四)德國崩潰以及德軍從俄羅斯南方撤退之後，烏克蘭的領土在內戰期中成爲了雙方獲得的目標；大家爭稱烏克蘭爲俄羅斯的一部分。(註五)蘇維埃的勝利，烏克蘭就成了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聯邦的一邦。

雖然如此，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聯邦西南的邊境和以前俄羅斯帝國的邊境卻並不一致。比

薩拉比亞在一九一八年春爲羅馬尼亞軍隊所佔領，但蘇維埃直至今日並沒放棄收回比薩拉比亞之權。一九二四年，在烏克蘭領土內建立了一個特殊的摩達維亞蘇維埃共和國用以作爲吸引比薩拉比亞地方人民的政治上的磁石。

更向北去，一大部住居着俄羅斯人的俄羅斯領土，根據一九二一年的和約由蘇維埃割讓給了波蘭。（註六）波蘭之北，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聯邦的邊境依着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約所劃定的界線。一九二〇年，蘇維埃政府和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以及芬蘭訂結了條約。

三

在東方，蘇維埃政府並沒有像牠在西方那樣很快的就固定了牠的邊界，但牠畢竟差不多達到了俄羅斯國家以前的邊界。

讓我們先來考察蘇維埃在近東和中東的政策。

蘇維埃政府對於土耳其的政策成功最少。根據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約，俄羅斯把巴屯、喀

斯、阿達岡 (Ardagan) 讓給了土耳其。巴屯及全部的外高加索最初爲英國軍隊所佔領；(註七)以後復由俄羅斯軍隊所克復，最後仍歸俄羅斯所保有。喀斯和阿達岡則確實的讓給了土耳其。

英國的佔據外高加索官方說是暫時性質的。但一九一九年英國外交在中東發生有極大的野心，是不可否認的。一九一九年八月九日在德黑蘭 (Teheran) 地方訂結了英波 (Anglo-Persian) 協同，它實際上把波蘭變了英國的一個保護國。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寇孫爵士 (Lord Curzon) 作了一次的演說，他指出「英獅立於前列，好像是保衛波斯權利及自由的倨傲而英偉的戰士。」英國軍隊駐紮在安齊列 (Enzeli) 及麥什特 (Meshed)。一小部的軍隊進了俄羅斯土耳其斯坦佔領了麥爾夫，在特瀉克 (Dushak) 戰敗了由一部分匈牙利戰囚組成的蘇維埃軍隊。有些英國軍官，在籌劃確立英國統治全部土耳其斯坦的計劃；但英國政治情形的不穩定，一部分又是共產國際在英國的宣傳，就使英國不得不放棄了他們中央亞細亞的計劃。一九二〇年英國軍隊就退出了土耳其斯坦，外高加索和波斯的北部。(註八)

英國的撤兵就堅固地確立了蘇維埃在中東的統治。在阿塞爾拜然 (Azerbaijan) (巴庫)

和亞美尼亞地方，早在一九二〇年就建立了蘇維埃共和國。同時喬治亞共和國與蘇維埃政府訂結了一個條約。越年，喬治亞發生了一個由莫斯科鼓動的共產黨革命，就宣布成爲蘇維埃共和國。一九二二——二三年，諸外高加索蘇維埃共和國，在在前面已經說過，（註九）組成了外高加索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加入了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聯邦。

在土耳其斯坦，蘇維埃政府應付了一次本地人，所謂『拔斯馬辛人』（Basmachi）的叛亂。這是個汎烏拉阿爾泰民族（Pan-Turanian）及汎回教（Pan-Mohammedan）的運動。牠是由有名的土耳其將軍恩佛（Enver Pasha）——他假裝了是一個蘇維埃的朋友到了土耳其斯坦，最後卻加入了拔斯馬辛人——所領導的。蘇維埃政府的地位有一時十分岌岌可危，不得不由蘇維埃最出色的軍謀家伽曼尼夫負起作戰之責。一九二二年七月伽曼尼夫把暴動鎮壓了下去，恩佛戰死了。

蘇維埃政府，在統制全局以後，就在土耳其斯坦採取行政的改革。根據工人代表的基礎，給予了某種程度的自治權。一九二一年春，塔什干地方設立了一個蘇維埃自治政府。基華和不花刺在

一九二〇——二一年建立了共和國，與蘇維埃政府發生了盟約的關係。幾年之後，基華和不花刺合併成爲月卽別蘇維埃共和國加入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聯邦。(註一〇)

與在中東確立了以前俄羅斯的邊界，同時，蘇維埃政府對於波斯又採取了一個新的政策。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牠和波斯訂結了一個盟約，根據這盟約，蘇維埃政府放棄了『舊俄政府的帝國主義政策。』(註二)它取消了所有以前在二國間以及俄羅斯與第三國關於波斯所訂的條約和盟約。蘇維埃政府把俄國所建築和俄國所有的自地求爾發(Djulfā)至塔夫列士(Tavriz)的鐵道交給了波斯。自安齊列(Fenzeli)至德黑蘭(Teheran)以及喀斯平(Kazvin)至哈麥屯(Hamadan)的軍用鐵道，和波斯借款銀行(Loan Bank of Persia)的資本，也一起交還了波斯。蘇維埃政府同樣取消了所有俄羅斯的債權。裏海南岸的漁業，規定在將來的會議中討論，由會議規定牠的開拓的條件，但蘇維埃政府仍保留開發這些漁場的權利。裏海的漁場是波斯和俄國間長期談判和引起誤解的主題。直至一九二七年十月，最後兩個訂結了一個協定，裏海的漁場在後二十五年中將歸一俄羅斯波斯公司開發，以一位波斯人爲主席，所有的產物由兩國

所均分。

四

當柯卻克在西部西伯利亞失敗之後，（註一）蘇維埃政府的地位而不能立即從事於征服全部的東部西伯利亞。一九二〇年，牠正忙於波蘭之戰和在南部俄羅斯與倫吉爾的鬭爭。一九二〇年春協約國的軍隊和捷軍離開了海參崴，（註二）祇有日本繼續的佔據海參崴及海濱，同時日本的傀儡謝米諾夫首領（Ataman G. Semenov）維持着在外拜喀勒的統治。柯卻克的殘餘軍隊退到了滿洲的邊疆。蘇維埃政府決定在拜喀勒湖東建立一個緩衝國家。一九二〇年五月十四日，蘇維埃政府承認了以赤塔（Chita）為首都的「遠東共和國」（Far Eastern Republic）。它的第一任國務總理是克拉斯諾希察可夫（Krasnoshchekov）即托培爾森（Tobelson），前芝加哥（Chicago）的一位律師。在牠建立以後，這新的共和國立即對於日本軍隊的繼續留在東部西伯利亞，以及對於日本扶助殘餘的白軍提出了抗議。同時，「遠東共和國」請求蘇維

埃政府予以援助。蘇維埃軍隊在一九二〇年進了赤塔，同時，日本的政策卻躊躇而沒有決定。一九二一年春，日本政府在海參崴幫助建立了一個反布爾塞維克的政府。海參崴政府的軍隊包含殘餘的白俄，但在他們得准許到海濱區以先即爲日軍所繳械。一九二一年九月，日本在大連和「遠東共和國」開始談判。談判決裂了，隨着就是一九二二年二月的華盛頓會議以及一九二二年九月的長春會議。日本最後通告她自願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底把她的軍隊退出西伯利亞大陸。唯一存留着沒有解決的問題，是日本的要求庫頁島的南部（註一四）。

沒有日本的扶助，海參崴的政府就不能抵拒布爾塞維克。白軍殘餘就解散奔往上海，海參崴就由蘇維埃軍隊所佔領。遠東共和國現在對於莫斯科已經沒有什麼用處了。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共和國的「國民會議」票決把全權移交於蘇維埃政府所委任的一個革命委員會。遠東共和國就不再生存了。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蘇維埃政府與日本訂結了一個條約。依照這個條約雙方重又確認朴資茅斯和約的條款。日本放棄庫頁島的北部，但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同意在島的北半給

日本若干的讓與。

五

蘇維埃政府與中國的關係，有由俄羅斯帝國留下的二件未決的複雜的懸案：中東路問題，和蒙古問題。

一九一五年歐戰時，在中國、外蒙，及俄羅斯之間訂立了一個三方合訂的協約，確定了中國與俄國對於蒙古的共同保護權。在一九一九年俄國的變亂中，中國就決定改變蒙古的地位，併歸中國，但西伯利亞的內亂不久就影響了蒙古。一部分俄羅斯的白軍，在一九二〇年初爲布爾塞維克趕進了蒙古。蒙古和中國的當局都無力加以阻止。不久之後，蘇維埃軍隊爲了要擊潰白軍最後的踪跡就進入了蒙古。由蘇維埃政府的煽動，蒙古就發生了一次革命，建立了一個革命的政府。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五日，在新的蒙古政府和蘇維埃政府之間就締結了一個互惠條約。在這個條約中，毫未提到中國，這種情形引起了中國統治當局中的極大的忿怒。

蘇維埃在中國的另一問題是中東路的管理。一九一九年蘇維埃政府宣言完全放棄了它對於這鐵道的權利，這個宣言發表時期，其時西伯利亞正在白俄統治之下，中東路是由協約國委員會所管理。蘇維埃政府不啻是慷他人之慨，但一年以後，情形發生變更，於是蘇維埃政府對於中東路的態度也隨着變更了。當蘇維埃軍隊佔據了海參崴時，中東鐵路問題就重又回復了以前所有的重要性——它是接連俄羅斯西部分領土的一條捷路。蘇維埃代表越飛 (Joffe) 在一九二二年坦白地向中國政府通告了蘇維埃政府的新見解。同時，中國的外交部長要求俄羅斯軍隊退出蒙古，承認中國在蒙古的主權。越飛與中國外交部長的談判就毫無結果的終結了。直至一九二四年，蘇維埃新代表加拉罕 (Karahan) 對於蒙古問題向中國作了讓步，纔訂結成了一個協定。根據這個協定的第五款，蘇維埃政府『承認外蒙古為中華民國的完整的一部分，尊重該地中國的主權』。蘇維埃政府也承諾把軍隊撤離蒙古。關於滿洲及中東鐵路蘇維埃和中國同意把這條鐵道視為一種純粹的商業企業，蘇聯承認中國在這鐵道擁有領土內的管轄權和警務權。蘇維埃政府也確認中國收買的權利。鐵道的管理在理事會的手中，理事一半是由中國政府任命，一半由蘇

維埃政府任命理事會主席由中國政府所委任。但關於這鐵道的債主——包括美國和日本，以及前俄羅斯道勝銀行（Russo-Asiatic Bank）的要求，這個條約並未把問題完全解決。並且當此外還得考慮當時統治滿洲的張作霖的要求。一九二四年九月三十日，蘇維埃政府和張作霖締結了一個關於中東鐵路的條約，其內容與前此的協同大致相同。但這問題直至現在還不能認為已有完全的解決。

六

爲了要保護牠的邊境起見，蘇維埃政府像任何資產階級的國家一樣，採取與牠隣邦和其他國家締結通商和政治條約的步驟。在這方向的第一個動力是「新經濟政策」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便締結了英蘇通商條約。新經濟政策的綱領傾向於給予外國人以讓予。

這時歐洲外交的轉向正與蘇維埃的意向相合。一九二二年歐洲在大戰之後還未曾完全恢復。政治的組織和經濟的福利都還沒有固定。大部歐洲的政治家都相信歐洲的復興祇有與俄羅

斯恢復常態的邦交而後纔可能。這種見解的主要代表是路易喬治。在沒有與俄羅斯和平之前，歐洲是不會有和平的。『歐洲工業國家的公衆輿論，以爲俄羅斯在原料的來源上，以及歐洲工廠生產的市場上都是不可缺的。至於俄國之由共產主義政府或資本主義政府統治，討論中並不加以重視。邦交不久又重新開始了。在許多歐洲國家中發生了一次競爭；大家都恐怕失掉了與俄羅斯重結邦交的適當的時機。同時勝利的列強更害怕德國將獨占了俄羅斯的商業，蘇維埃的外交就巧妙地運用着這種存在於西歐列強中的恐懼心。

一九二二年一月六日於格來西（Cannes）舉行的協約國最高議會的會議，是趨向與蘇維埃俄羅斯恢復邦交的第一步。會議中討論着可以使受歐戰創痕的國家實現經濟復興的條件。俄羅斯是討論中的主要題目。兩項主要的條件是：（一）承認所有以前的債務，（二）發展一種常態的財政與商業的組織。同時最高議會接受不干涉各國經濟生活的原則。

一九二二年四月十日於熱拿亞舉行的會議，是第一次包括蘇維埃政府代表的國際外交的集會。蘇維埃代表最初的宣言是很認真的，使歐洲政治家希望一定可以成立某種的協定。在試驗

和開端的時期，姬采林 (G. V. Juchacz) 宣言預備承認戰前以及戰時俄羅斯的債務，和把沒收的外人財產，發還或給予賠償。另一方面他要求即刻承認蘇維埃政府和極大的信用借款。他更提出了協約國賠償干涉俄羅斯內戰而引起的損失的反要求。協約國對於姬采林提議之意見不一就很顯明了。英國和意大利願意加以考慮，而法國和比利時則甚至拒絕討論。這種不和的根本，是由於以前法國和比利時在俄羅斯南方的讓子權問題而起的。路易喬治想與蘇維埃政府成立直接的協定，替英國獲得經濟上的特權，俄羅斯煤油的全部出產及出口，就將成了皇家荷蘭殼牌公司 (Royal Dutch-Shell Company) 的獨占品。當這些談判傳出之後，美國的「旁觀者」就警告會議，宣稱美國對於俄羅斯煤油將堅執主張「開放門戶」的政策。

協約國利害的衝突，就引起了熱拿亞會議的失敗，尤其因為一九二二年四月十六日蘇維埃政府與德意志在拉伯羅 (Rapallo) 地方單獨的締結了一個條約，形勢就更為惡劣了。這個條約兩國同時放棄一切賠償損害的相互要求。德國放棄贊助公民的賠償在俄被沒收了的財產的要求，「假定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並不滿足其他國家同樣的要求。」德俄間完

全的外交和領事的關係，重行恢復。條約第五款規定：『兩政府當交互援助以供給兩國的經濟需要……德國政府宣稱自己預備儘可能的在兩國間私有企業中訂結契約而執行之。』

熱拿亞會議所沒有解決的問題，就移交了定於一九二二年六七月中，在海牙召集的『專家委員會』討論。但這時，莫斯科因為前此之未能與各『資本主義國家』政府成立協定，就採取了一種頑強的態度。蘇維埃的代表是以這種不妥協的神情來參加海牙和會的。因此之故，協約國的代表雖格外遷就想和蘇維埃親善，結果也失敗了。

七

雖然接連兩次會議的失敗，蘇維埃政府在同年秋季又被邀請出席在洛桑(Lausanne)舉行的一個新國際集會。牠的主要目的在討論韃靼尼爾海峽問題及與土耳其訂結一個永久的條約。蘇俄和土耳其帶一個共同的綱領出席洛桑會議。他們都要求韃靼尼爾海峽除了土耳其的軍艦外其餘各國軍艦一起不准通行。英國在另一方面，希望把這個海峽依舊開放給各國軍艦和商船。

這個態度的根本理由，是可使高加索各部——而尤其是巴屯，巴庫油產的出口——保留在英國的支配之下。最後賴於由法國的調解，最後得到了妥協。軍艦總噸數如果不超過黑海主要海軍國——即俄國——的海軍噸數，仍可以通過海峽。土耳其代表並沒有預先得到蘇維埃代表的同意，就接受了這個提議。姬采林於是就拒絕簽字，並警告列強宣稱這問題在沒有俄羅斯，烏克蘭，及喬治亞參加以前，不能視為已經解決。

洛桑會議似乎也將沒有實際的結果而散了。雖然如此，因為可以和其他列強一起簽署一個國際性的條約，可以視為其他署約者的一種法律承認蘇維埃政府，蘇維埃就為這個機會所吸引了。所以一九二三年七月杪，蘇維埃代表同意了在君士坦丁堡簽了洛桑所訂的條約。但聲明現狀的不滿人意，因而保留以後提出關於海峽的新議案的權利。

(註一) 這與威爾遜總統邀請在普林吉卜開會相應。參看前面第十六章第六節。

(註二) 匈牙利的孔貝羅 (Bela Kun) 的共產政府，從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繼續至八月一日。一九一九年四月七日，巴威蘇維埃政府成立，其生存的時期更為短促。

(註三) 參看後面第二十章第四及第七節。

(註四) 參看前面第十五章第七節。

(註五) 雖然蘇維埃政府已正式的承認了烏克蘭爲獨立的國家，參看前面第十八章第五節。

(註六) 參看前面第十六章。

(註七) 參看前面第十六章。

(註八) 一九一九年英波協定沒有經波斯國會的批准，因而就沒有實現。

(註九) 第十八章第五節。

(註一〇) 見前第十八章第五節。

(註一一) 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八日蘇維埃政府與土耳其的條約中，表現出了同樣的觀念。

(註一二) 參看前面第十六章第十節。

(註一三) 美國的最後的軍隊於一九二〇年四月一日撤退。

(註一四) 庫頁島北部在一九二〇年夏爲日本所佔領了的。

第二十章 列寧死後蘇維埃之對內及對外政策

一

在布爾塞維克統治的最初幾年中，列寧是俄羅斯的絕對的獨裁者。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五日，他中風一次。同年十月，他回復了健康繼續着他的工作，但在十一月底，他的病勢就更壞了。一九二三年三月他遭了第二次的中風，使他失去了說話的機能。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便去世了。

他死後的短時期內，列寧的精神繼續統治着俄羅斯。他的言辭成了一部共產黨的聖經，由這部聖經，他的信徒就探求着政治上的領導。沒有一個黨的演說家在演辭中而不引用列寧的演辭的。他在莫斯科的墓塚，成了共產黨的神座。彼得格勒，「彼得大帝之城」，改稱了列寧格勒——

「列寧之城」

但列寧的死終於就引起了誰繼爲俄羅斯共產黨領袖以及蘇維埃政府的首領的問題。最初一個三人執政團——包括伽曼尼夫、齊諾維夫和斯達林，替代了列寧的位置。這三位布爾塞維克黨人都有悠久的歷史。伽曼尼夫，他的真名是盧森弗爾，三人中最缺乏革命的氣質，所受的教育最完備。齊諾維夫的真名爲亞弗爾蓬（Apfelbaum），他是一個既無道德又無才幹的僭妄誇大的人。他所以得到黨的領袖地位的原因，主要就由於他對列寧的卑諂的態度所致。斯達林，一個喬治亞人，他的真名是裘伽希維列（Djugashvili），他具有堅決的意志，不可否認的組織的能力，這種特色就使他在蘇維埃政府中得到了一個卓越的地位。

次於列寧的最卓越的領袖，俄羅斯革命的最大演說家，無疑的，就是托洛斯基。但他卻被「三人執政團」剝奪了權力，他立刻就發起了一個反對他們的運動。他的政策，兼有個人的動機而主義的不同。他一向就不是一個正統的共產黨。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以及次年的時候，他常常回旋於布爾塞維克和門希維克之間，有許多次他聯絡着後者。直至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之後，他纔最後走上了布爾塞維克的路線，成爲布爾塞維克暴動的一個領袖。但即在那時以後，托洛斯基還發

表了許多不爲列寧或大部共產黨所容納的見解。所以在列寧死後，托洛斯基忽然會成爲純粹共產主義思想的代表，毋寧是出於意外的。他攻擊伽曼尼夫和齊諾維夫，說他們缺乏真正的革命精神，他指出在布爾塞維克革命的兩星期前，齊諾維夫和伽曼尼夫在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裏投票反對起事。托洛斯基的控狀引起了共產黨領袖中的激辯。黨裏產生了許多不同的派別，托洛斯基成爲中央委員會反對派的領袖。

二

托洛斯基的信徒申斥大部分共產黨的資產階級的傾向，而自稱他們爲純粹共產主義的護士。新經濟政策是托洛斯基反對派攻擊的主要目標，早在一九二二年當列寧還活着的時候，共產黨會議宣布『經濟前線的退卻』已告完成，但列寧死了一年之後，又開始了一個新的妥協的時期，主要的是對農民的讓步。

一九二五年春，蘇維埃政府和農民間的關係十分的緊張。共產黨的主要的理論家真理報

(Pravda)的主筆布哈林(N. I. Bukharin)承認雖然有新經濟政策，但「戰時共產主義」的影響還可以在鄉村經濟中看出。農民不相信在蘇維埃政體之下他們農場的恢復可以得到保障。二年後——一九二七年初——斯達林也願意承認在一九二五年前農民問題使共產黨受到了極大的壓迫：「我們在鄉村裏的官吏被殺死了，他們的屋舍都被農民縱火燒了……有些地方，尤其是其是在邊界境地，我們會和有組織的匪徒的活動苦鬪；我們曾在喬治亞鎮壓了一次真正的農民的暴動。」

因為這些事實，蘇維埃政府就決定採取一個對農民較為有利的政策。一九二五年春共產黨第十四次大會，核准了這個新的農民政策。「現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去重行鼓舞中農團體集合在勞動之下；我們得征服中農團體的同情。」這是斯達林在會議中解釋着黨的目標時的見解。同時，蘇維埃聯邦的主席加里寧(M. I. Kalinin)以及蘇維埃政府的總理列谷夫激烈的演說主張農村的救濟。

蘇維埃政府的新農民政策，被認為比新經濟政策更進的發展，在共產黨中引起了一個新的

反對的爆發。因為蘇維埃的二位領袖，齊諾維夫及伽曼尼夫也都加入了反對派方面，所以黨的統一的情勢就格外危險了，爲蘇維埃領袖背棄純粹批評者把新政策作共產主義的例子。當黨的中央委員會辯護牠的政策是聯結中農團體的手段時，反對派的領袖就斥中央委員會爲救濟富農。蘇維埃領袖如何區分農民團體的方法，是很有意思的。根據提供該黨第十五次大會的資料，每人每年收入在三十九元的爲「貧農」階級，每人年收入四十六元的爲中等階級，每人年收入八十八元的爲「富農」階級。此外，反對派攻擊多數派領袖在黨的管理中的專制。他們要求取消政治局的獨裁權力。反對派的領袖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該黨第十四次大會中對多數派發出了鋒利的批評。但這次的大會終於批准了中央委員會的政策。斯達林戰勝了他的反對派，還沒有感到反對派領袖加以懲戒的需要。他僅限於下列的警告：『黨希望統一，而終將完成統一，如果伽曼尼夫及齊諾維夫願意，則他們可以一起參加，如果他們不願意，就不要他們。』

三

列寧死後蘇維埃的對外政策遵從着列寧所提出的二條路線：一方面是共產國際的路線，趨向於世界革命；另一方面是新經濟政策的路線，即趨向「資產階級」的目的，通商協同，以及法律上承認蘇維埃政府。一九二四年是積極趨蘇維埃政策向這兩方向的一年。新經濟政策的主要的鼓吹者克拉森（J. B. Kassin），在一九二四年一月第十三次共產黨大會議中的演辭裏，說明外國資本的幫助，爲阻止蘇維埃政體破產所必要。「但要得到外國的幫助，就必須採取一種更和平的態度，降低世界革命的旗幟。」

共產國際沒有接受克拉森的見解，相反，那時的主席齊諾維夫表示相信國際革命的一個新的波動已經發動了。一九二四年六、七月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五次共產國際大會完全批准了這個見解，採用了一個不妥洽的政策。不管共產黨領袖中的心志狀態如何，但恰恰同時歐洲外交界卻表示願意承認蘇維埃政府，爲合法政府。這一部分是因爲歐洲的輿論完全沒有知道共產黨政策的改變，而在另一方面，希望蘇維埃外交方面有更大的讓步。

英法選舉中工黨和急進黨的勝利，也造成了同樣方向的趨勢。英國是最先法律承認蘇維埃

政府的國家。早一九二三年底，承認蘇俄已包括在英國工黨黨綱之中。工黨勝利之後，麥唐納（J. R. MacDonald）的勞工內閣在一九二四年二月一日第一次集會中，表示實現這個諾言。意大利，挪威，奧地利，希臘以及瑞典在兩月內也隨從了英國的先例。不過英國的承認蘇維埃俄羅斯並不是無條件的，於是就進行了長期的談判。第一，不列顛的通牒祇承認那些前俄羅斯帝國部分以內願意承受蘇維埃權力的地方。第二，英國政府要求蘇維埃承認俄羅斯在蘇維埃以前的債務。最後，牠要求蘇維埃政府停止反英的宣傳，尤其是在亞洲方面的反英宣傳。一九二四年四月，蘇維埃派遣了一個代表團到倫敦與英國政府進行談判。但幾個月中談判沒有產生什麼結果。當英國要求蘇維埃承認俄羅斯的債務時，蘇維埃代表要求一筆借款使他們政府可以開始清償這筆債務。直至一九二四年八月八日纔簽訂了一個協定。這是一個奇特的文件，把所有重要的問題差不多都擱為懸案。二方面祇決定在以後得到一個真正的協定。

麥唐納的企圖和蘇維埃發生親善的關係，這樣證明沒有成功，這祇使他失掉了衆望。一九二四年十月八日，他在國會裏失敗了，於是就不得不解散了下議院，於十月二十九日舉行新選舉。在

選舉前數天，英國報紙上刊出了一封聲稱爲齊諾維夫的祕密信。這封信包含準備在英國發起一次共產黨暴動的訓令，在選民中引起了極大的忿怒，大大的幫助了保守黨的戰勝工黨。（註一）新的保守黨政府取消了一九二四年八月八日的協定，但並未收回二月一日的同意的承認。所以這個時期的英蘇關係，最終卻來了一個很奇異的妥協形式。上外交的承認仍然有效；但事實，這祇使二方完全的疏遠。

雖然英國是失敗了，法國卻還追隨着英國的成法。一九二四年五月由赫禮歐（Herriot）爲領袖的左翼政團，在選舉中占了勝利。十月二十八日，法國政府正式承認蘇維埃政府。但俄羅斯對於法國的債務問題並沒有解決，後來的談判還是毫無要領。同時在法國和英國一樣，刊布了共產黨的祕密訓令，這無疑是共產國際方面的革命的宣傳。在摩洛哥與阿布的喀里（Ab-el-Krim）領導的叛族作戰的法國兵士也受到了影響。保加利亞的事件，更證實了遍布於歐洲的宣傳的存在。（註二）

一九二四年後，東方和西方目擊着共產黨活動的擴張。這年締結的中蘇條約，以及蘇維埃外交在蒙古的努力都已在前面敘述過了。（註三）這時中國的内部情形正十分的混亂。中國自從一九一一年——一三年革命後事實上顯然已割裂成爲幾部分，袁世凱統治着北方，孫中山統治着南方。一九一六年袁世凱死後，軍人派在中國北方得到了最高權，各軍閥互爭着獨裁的位置。蘇維埃政府就想聯絡其中的二位——滿洲的軍閥張作霖，和在內蒙組織軍隊的所謂『基督將軍』的馮玉祥。一九二四年，蘇維埃政府與張作霖締結了一個關於中東鐵路的條約。（註四）但翌年他們之間發生了意見，張是傾向於接近英日，蘇維埃就設法聯絡中國南部的民族運動。這個運動是在一九二五年之初開始的。南方的革命領袖孫逸仙在這時去世了。但他所組織的國民黨繼續他的革命工作。在民族主義的運動之外，加了一種工人與農民的運動，由憤於歐洲列強帝國主義的智識份子及學生所領導。國民黨中包含一個強有力的共產派。當孫逸仙還活着的時候，國民黨曾

和莫斯科的共產國際發生了密切的關係，蘇維埃政府願意扶助中國南部的運動。一個卓越的共產黨，鮑羅庭（M. Borodin）被委為廣州國民政府的顧問。一九二五及一九二六年時國民政府的統治就擴張及於揚子江的中段。

五

歐洲的政治家認清了國際共產宣傳的危險，他們就感得急迫的需要促進歐洲的穩定。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的洛加諾會議（Locarno Conference），就是走向這個目的的一個重要步驟。在會議中，德、法、英合作一致，一個協定的系統造成了，約定以公斷為裁決爭論的方法。

蘇維埃外交認為這個會議是用意在於『隔絕』蘇維埃俄羅斯以及『造成一個反蘇維埃聯合陣線』的一種國際的企圖。蘇維埃戰略家就亟望衝破這個陣線，而德國就是陣線中最易攻破之點。雖然德國被邀參加洛加諾會議，但她在歐洲的外交界中還沒有得到平等的資格，因為她還沒有許可加入國際聯盟。所以自然蘇維埃就想與德國發生密切的關係，而在德國方面，也準備

以與蘇俄結成同盟的可能性，威脅西方列強使他們從速准許她加入國際聯盟。（註五）恰當在德國代表出發至洛加諾以前，姬采林在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二日和德國締結成了一個商約，同時允許借給蘇俄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的借款。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洛加諾會集的幾月之後，在柏林締結了一個蘇維埃德意志的條約；雙方都維持着友善的接觸，如果二者中的一國受第三者武裝攻擊時，另一國須保持中立。（註六）德國附着條約原文的公文，指出牠的目的之一是反對在國際聯盟中，反蘇維埃的趨勢。這個條約證明了是德國方面的一個絕妙的手段；它使她在一九二六年九月七日加入了國際聯盟。

六

洛加諾會議之後，蘇維埃外交就加強了對英的攻擊。『張伯倫（Sir J. Chamberlain）相信他在洛加諾把我們包圍住了』——俄羅斯共產黨在莫斯科的機關報真理報這樣的說。『相反，我們將用他本家的勞動大眾把他包圍起來。』

英國的勞工狀況確實極其不安。一九二五年九月，在斯喀彼羅（Scarborough）舉的英國工會大會議，以二、四五六、〇〇〇的大多數對一、二一八、〇〇〇人而通過了一條激烈的議案，反對以和平手段的原則解決勞資間的糾紛。是年十二月，齊諾維夫在第十四次俄羅斯共產黨大會中作下列的陳述：『可以預料在一九二六年五月之前在英國會發生一次礦工的大運動，一種真正革命的勞工運動正在英國開始』。一九二六年三月，齊諾維夫說英國正在社會破裂的前夜。『如果這次的罷工真正的開始，我們的第一個工作是要幫助他，依據着工業戰爭的歐洲及國際的陣線。』英國礦主與礦工談判的決裂，就引起了一次總罷工，但不久罷工以完全的失敗而結束了。礦工的罷工直繼續至一九二六年秋季。在這整個時期中，蘇維埃政府以金錢及宣傳支助着英國的罷工運動。至是年五月止，蘇俄送給了英國礦工一、三〇〇、〇〇〇元。至七月，莫斯科的補助的款項總計達二、二二五、〇〇〇元。

於是就有一種打算，使莫斯科的領袖和英國工會總理事會間得到一種諒解，以工會的英俄委員會為折衝者。談判終於並沒有得到一個協定，英國的總理事會不願接受莫斯科的不可調和

的見解。不錯，英國工會的少數派在一九二六年八月三十日的倫敦會議中接受了莫斯科的主張，但是在第二年九月於包尼木斯（Bournemouth）舉行的工會大會中，以二、四一六、〇〇〇票的大多數把牠否決了。

七

英國罷工失敗的結果之一，使共產國際中央機關的人員發生了調動，國際的前主席齊諾維夫失去了他的職位，一九二六末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三國際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全會中，布哈林代替齊諾維夫佔據了一個重要的地位。同樣，在十一月初的俄羅斯共產黨第十五次大會中，申斥齊諾維夫的政策爲一個革命投機者的政策。（註七）但事實上，共產國際的革命政策都依舊並沒有改變。布哈林發表和齊諾維夫所執的同樣的不妥協的見解。「共產黨是革命的政黨；共產國際是領導革命的全世界的勞工組織。」

第三國際領袖們的注意，現在就轉向東方了，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與土耳其締結了一

個互惠條約。次年十一月，姬采林在奧特薩與土耳其的外交部長會晤，而稱頌土耳其爲蘇維埃對抗歐洲帝國主義的忠實同盟。並且在一九二六年九月與阿富汗訂了一個協同。但共產國際對抗歐洲帝國主義的主要戰場是中國。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國國民軍開始對北方的軍閥作了一次新進攻，九月國民軍占領漢口。這年年底蘇維埃在中國的勢力就到了最高點。

共產國際的領袖設法的想把他們的活動從中國擴張到荷屬東印度，那裏，在十一月發生了一次沒有成功的共產黨的暴動。次年在漢口發生了一次總罷工，宣布了抵制外貨，同時發生了激烈的反英示威運動。一月四日，羣衆侵入漢口的英租界。三月二十二日國民軍佔領了上海——除了外國租界——，在第二天占領南京。

國民軍的軍事活動，因爲內部的爭訐而暫時的中止了。國民黨的保守及穩健派與共產派間的不和，在一九二六年秋便開始了。翌年春，這種不和就更激烈了，在中國國民軍總司令蔣介石將軍與鮑羅庭顧問之間發生了衝突。四月六日，北京的警察得到了外交團領袖書面的准許，搜查北京的蘇維埃大使館。搜獲的許多文件，暴露了蘇維埃外交與國民黨內共產分子的密切關係。文件

也暴露了鮑羅庭篡奪國民黨的陰謀。這些文件的發表，就使蔣介石與想在漢口組織一個純粹共產政府的鮑羅庭間完全的決裂了。在鮑羅庭的計劃還沒有成功之前，他就不得不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出走。

次年十一月，共產黨幫助在廣州發動了一次暴動。他們占領了廣州，但經過了三天的鬭爭，他們終被國民軍所消滅了。中國國民政府就宣布與蘇維埃政府斷絕關係。

八

蘇維埃在中國事件中所佔的地位，使英國政府的忍耐到了最高的限度。從北京大使館中所搜出的文件，蘇維埃政府設法在中國煽動反歐的騷亂，已經十分的明顯。（註八）中國民族運動的第一個攻擊對象是英國，蘇維埃的參加其中是違反了一九二一年蘇維埃政府對於英國的約言。英國政府就決定有所行動。整個的一九二七年，牠漸漸的鼓動輿論與蘇俄決裂。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二日，蘇格蘭軍營（Scotland Yard）的代表搜查倫敦的蘇維埃商會愛

科斯有限公司 (Arcos, Ltd.) 的總公司，蘇維埃合作社，商業公司以及不問外交人員的不可侵犯權搜查蘇維埃商業代表團本身。內務部長解釋說政府的一件關於軍事祕密的文件，爲人竊取潛匿於這幾所房屋中。這個文件並沒有找到，但搜獲了些其他的文書，在英國政府的意思，這些文書可以證明英國這次行動的合法。蘇維埃致送了一件抗議的文書，指出英國破壞了一九二一年條約所給與蘇維埃商業代表團的不可侵犯權。整個的問題就在這月底的衆議院中討論。首相鮑爾溫 (Stanley Baldwin) 在議院前提出若干搜出的文書，宣言說它們證明『有一個由蘇維埃當局直接支配的有規則的交通機關，把俄羅斯各種組織發出的破壞性的文書祕密的轉給在本國或他地從事於共產工作的人物。』換句話說，他想說在蘇維埃政府及其產國際間的分別祇是一個託辭。

由所有這種觀察的根據，就由內閣建議與蘇俄斷絕外交關係，並由國會所核准了。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七日，英國政府把牠的決議通知了駐倫敦的蘇維埃公使代辦。同日鮑爾溫發表了下列的宣告：『我願懇切地說我們的外交關係的破裂，絕不是意在或包含對俄作戰的意思。』二國

間的普通的商業便利並未受侵擾。愛科斯有限公司的若干雇員就被逐出了英國境外，但其他則仍准許留居繼續他們的工作。

九

英國對於蘇維埃政府的政策是有變化，同時美國的政策卻堅固地以不承認爲原則。英俄的決裂，似乎加強了這種態度的理由。但在美國有些財政界中，對於這個問題卻有一個不同的見解，他們提出了恢復與蘇俄的邦交的理由。兩國間商業的不斷的發達，就是贊成變更的一個理由。美國與俄羅斯貿易的周轉數在一九二七年總計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比歐戰前的總計大一倍。（註九）

一九二七年秋，英美商業利益關於蘇維埃煤油發生了一次劇烈的衝突；在美國自己方面也可以看出一種分裂的痕跡。一九二七年七月，紐約的美孚煤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及真空煤油公司（Vacuum Oil Company）——美孚的另一個會員——與蘇維埃石油辛迪

加 (Soviet Naphtha Syndicate) 訂結了一個購買煤油的契約。紐喬賽 (New Jersey) 的美孚煤油公司就對於這種處置提出了抗議，極力主張在與蘇維埃政府作任何交易之前，被剝奪財產權利的前主人，應當得到賠償。皇家荷蘭殼牌公司的領袖提探定爵士 (Sir Henry Deterding)根據同樣的理由提出了一個更強硬的抗議。蘇維埃政府的代表就宣布紐喬賽的美孚煤油公司以及皇家荷蘭殼牌公司都會設法的要求得到俄羅斯煤油出口的獨占權，蘇維埃政府不願給這些行家以獨占的特權——因此就引起了他們的忿恨爲答復這個控狀，提探定爵士承認他曾和蘇維埃談判過，但申明同時他時常要求給予前主人以賠償。直至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因這問題而起的爭執仍未解決。

十

全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該黨第十四次大會中的戰勝反對派，(註一〇)並不是最後的。反對派設盡種種方法來在黨內增加牠的勢力。一九二六年牠建立了牠自己的組織，有牠自己的

委員會和一個祕密的印刷所。一九二六年九月及十月之初，牠的領袖設法在列寧格勒及莫斯科的各種大工廠的工人面前攻擊中央委員會，想吸誘工人歸到他們的一方。但這些努力對於反對派卻很不利，因為工人們依舊向中央委員會效忠。反對派認清了他們的失敗，在十月十六日，他們就向中央委員會提出了一個請願書承諾停止內部的鬭爭，與黨的多數派共同合作。斯達林不預備以這個陳述為一種真正的悔過，他於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一舉行的共產黨第十五次大會議的演辭中，對反對派作了最猛烈的批評。他提出了反對派下列的主要的『罪狀』：（一）牠的領袖設法想使共產國際遵循投機革命的道路；（二）他們提議向農民徵取最大負擔的稅款，這樣就使農民和工人間發生一個不可避免的裂痕；（三）他們想弛緩黨對全俄羅斯的獨裁；（四）他們要求在黨內確立一個『民主的政體』，鼓吹減弱中央委員會的獨裁權。斯達林的結論是，反對派的領袖假托純粹的共產黨的原則來遮掩他們真正的用意；同時事實上他們的政策浸透了機會主義趨向於中等階級政體的恢復。這個見解，由黨的大會議所接受，由中央委員會所核准。

但共產黨內部的和平沒有維持多久。一九二七年夏該黨多數派與反對派之間的關係又很

緊張了。斯達林決定對反對派的領袖施以懲罰。他指托洛斯基和齊諾維夫爲造成黨的分裂的罪魁，要求把他們開除黨籍。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共產黨的一次新的大會前就通過實行了。

十一

全聯邦共產黨第十五次大會舉行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這次的會議不特對於黨的內部發展，並且對於全國的蘇維埃政策，都有極大的重要性。這次的會議，中央委員會完全戰勝了反對派。大多數的代表都是中央委員會的黨羽。反對派並沒有一個領袖，托洛斯基已被開除了黨籍。在會議中，各工人組織的代表發表了許多攻擊反對派的演說。

中央委員會提議把所有反對派的領袖一起開除黨籍。委員會中一位擔任研究這個問題的委員，報告國內的反革命份子開始以反對派的領袖爲中心。援引他自己的話：『反對派領袖已成爲無產階級獨裁的公開敵人。』十二月十八日，所有反對派的領袖都被開除了黨籍。（註一一）反對派領袖政治上的任務就這樣告了結束。

但斯達林和他的黨羽摧毀了反對派後，終於把反對派的許多提議，包括在自己的綱領以內，避免背棄純粹共產主義的攻擊。

鑒於這些發展，所以第十五次大會並不像有些專門的觀察者最初所設想到的「右傾」，反是轉向於左傾。從經濟的觀點而言，這次大會的注意大部分集中於工業方面。俄羅斯從速「工業化」的必要列入了黨的綱領之內。關於農業我們已經看到，（註一二）在前次一九二五年的大會中已採行了有利於農民經濟的措施。第十五次的大會從經濟觀點上承認了這些措施的價值，說明在採用了這些措施之後，耕地已有很大的增加。但同時，這次的大會說這種政策對於蘇維埃在政治中有不利的結果，它提到了富農階級的發展。因此，大會就決定放棄了過去這種的農民政策。第十五次大會的決議確定向富農階級作一次新的進攻的必要，和督促改變農民經濟使之日益與社會主義的模型契合。

大會批准了百分之三十五的農民可以免除付稅。這種免除是直接利於所謂最「貧農」的階級的。大會所批准的其他政策，為贊助農業合作的運動，集體農場（Kolkhoz）的發展，以及國有

大農場產業 (soukhoz) 的擴張。

因此第十五次的大會就計劃把農業從新經濟政策回復到社會主義的經濟。

十二

關於對外政策，第十五次大會批准了莫斯科和資產階級國家成立一種和平關係的原來的外交方針，但同時自己準備和資本主義世界作決死的鬪爭。

這一項事件，在第十五次大會中有下列的議案：

「本黨中央委員會應依遵下列諸基本方針築成其對外的政策。一、執行一種國際和平的政策，與帝國主義戰爭的危險性鬪爭。這種國際和平的政策，同時也是在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內發展社會主義的一個基本條件；二、用各種方法加強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和西歐國家的工人以及其他被壓迫國家的勞動階級之間的友善關係；三、更進一步與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系統的經濟關係的發展，惟須保障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經濟的獨立；四、由不斷的加強國防的方

法，尤其是工農的海陸軍的戰鬥力；五、積儲必須的經濟準備，如穀物、貨物、錢幣以爲國防的特殊準備。

這個議決案的第一點，使蘇維埃在一九二七年秋國際聯盟之前提出了軍縮的提議。

一九二七年的幾年之前，蘇維埃外交故意不理會國際聯盟，在共產黨看來它祇是一個國際資本主義的機關而已。因此，當一九二六年二月蘇維埃被邀參加日內瓦的軍縮會議時，牠藉口一九二三年五月十日蘇維埃專使伏洛夫斯基(VOLOVSKY)在瑞士境內被暗殺後已與瑞士沒有關係而拒絕了。以後蘇維埃政府終於改變了牠的態度，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發表了一篇陳述，說牠願意參加軍縮會議。蘇維埃向會議所提出的草案，規定即刻遣散所有存在的武裝軍隊的一半，把軍器和軍備，作相應的毀滅，和停止一切海、陸軍的建築。遣散和毀壞繼續進行四年，直到最後僅餘專供治安和邊防之用的軍隊。各國海軍由一種國際海軍警察代替。監督軍縮條約的實行，交託給一個根據平等的基礎而組成的得工人階級參加的永久的國際委員會。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九日，蘇維埃代表李維諾夫(M. M. Litvinov)發表了一篇沉長的演

辭，解釋蘇維埃的提案。德國及土耳其的代表都贊助他的意思，另一方面英國代表卡森登爵士（Lord Cushendun）強硬地反對他們。他的演辭包括下列的話：『戰爭的種類有二，在有兩種戰爭之處，就有兩種的和平。有國際的戰爭，也有國內的戰爭，而內戰尤其來得可怕。蘇維埃政府是否以對國際戰爭的堅決態度同樣的對付內戰，這是一個應該質問的問題。……過去的幾年，蘇維埃世界政策的整個基礎，就是在他們勢力所能及的各種煽動達於內戰程度的武裝暴動。如果是這樣，那麼在我們作更進一步之前，蘇維埃政府應該給我們些保證，他們在這一方面的政策將有一個完全的改變。我們應該知道究竟蘇維埃政府現在是否決定不再干涉他國的內政。』輪到美國代表團的主席幾卜生（H. S. Gibson）時，也反對蘇維埃的提案，同時解釋美國政府贊助一種多邊公約的思想，申斥以戰爭作為國家政策的一個工具。

十三

蘇維埃提案在日內瓦會議被排斥之後，美國代表所表示的見解就成了國際外交第二步的

出發點。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由十五國的代表——包括英國自治領地——在巴黎簽訂了一個非戰公約。蘇聯並沒有被邀參加為原簽署國，美國將公約並附通牒要求各國加入時，蘇聯也不在其列。因為兩國之間並沒有外交上的關係，所以美國政府不能把這樣的公文送交蘇維埃聯邦政府。法國就正式作為一個中間人，把加入的問題提交了蘇維埃政府。

一九二八年八月三十一日，蘇維埃政府簽字接受了這個公約。但牠的加入是不十分誠意的，蘇維埃領袖有一個機會便激烈的加以攻擊，把它看出為一種欺騙勞動大眾的資產階級的總計。蘇維埃領袖對於這軍縮問題的眞眞的主張，在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七日至八月二十八日於莫斯科舉行的第六次共產國際大會有很明白的說明。大會毫不遲疑的說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國家中正在準備一次新的世界大戰。大會辯論着勞動大眾應採用何種戰略來改變這個假定的迫切的戰爭。

根據大會的議案，關於這點，全世界所有的勞工有一種三重的的工作。第一，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當與他們自己的政府戰鬥。第二，全世界的無產階級當防衛蘇維埃聯邦反對帝國主義

的仇敵。第三，無產階級必鼓吹受列強支配的殖民地的革命運動。

爲了實行第一件的工作，各國的無產階級就當立刻設立一個工人「支部」的祕密組織，尤其是在那些製造軍需的工業中。在戰爭爆發之時，這種組織應當猛烈的宣傳採用一種「戰敗主義」的綱領，設法使各國之間的帝國主義戰爭轉爲國內無產階級對抗中等階級的階級鬥爭。大會關於「殖民地及次殖民地國家內革命運動」通過了一個特殊的議案。

根據這議案，共產國際的當前工作就是在那些殖民地及次殖民地國家內建立和發展共產黨。

牠特別的注意及美國與南美諸國間的關係。大會表示意見，認爲拉丁國家畏懼北美帝國主義，因之兩方的關係漸趨緊張。議案的一節要求拉丁國家所有的共產黨合併成爲一個統一的組織，並主張與美國的無產階級積極合作。

除了殖民地國家的問題之外，他們的議案更着重在黑人中的宣傳，尤其是在美國的黑人中。議案的另一節主張共產黨應向黑人工人和農民解釋，使他們相信共產黨是唯一可以解決黑人

問題而使黑人解脫白人資本主義的『野蠻桎梏』的政黨。

(註一) 共產黨否認這封信的真實性。

(註二)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五日，發生了一次謀殺保加利亞柏列斯皇帝 (Tsar Boris) 的案件，一個保加利亞的將軍被謀殺了，在他的葬儀中，舉行祭儀的教堂建築被人炸毀，死了一百五十餘人。這種計謀的組織人立刻被逮捕，共產黨在保加利亞暴動的計劃就阻止了。

(註三) 參看前面第十九章第五節。

(註四) 參看前面第十九章第五節。

(註五) 這次外交情形很和熱拿亞，拉柏羅時期的相似。參看前面第十九章第六節。

(註六) 這是德國對於國際聯盟三月會議她所得到的侮辱——當時她的代表雖然被邀到了日內瓦，但卻沒有被接受為一個盟員。——後向西歐列強的一種報復。

(註七) 參看後面第十一節。

(註八) 參看前面第七節。

(註九) 在一九一三年為四八、〇〇〇、〇〇〇元。

(註一〇) 參看前面第二節。

(註一一) 一九二八年一月杪，托洛斯基被充軍到土耳其斯坦的阿爾馬亞他 (Alma-Ata) 卽前飛魯乃 (Vierny) 城。

曼尼夫和齊諾維夫要求中央委員會的紋免，表示他們願意放棄他們的反對，由這個方法，他們就免掉了充軍的處分，在俄羅斯中部省的縣城裏任卑微的職位。一九二八年夏，兩人都回復了黨籍。

(註一二) 參看前面第二節。

結論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七日舉行了蘇維埃國家第十一週紀念。俄羅斯內戰結束之後，已過了八年。但蘇維埃國家的地位還不能認為已歸常態，相反很明顯它趨向着一個新的危機。

蘇維埃政府顯然的未能解決牠的複雜的經濟問題。其中最嚴重的是工業與農業的生產不能與不斷增加的人口的需要相應。援引經濟生活(Economic Life)——蘇維埃主要的經濟日報——，「生產與消費不能平衡。」

雖然我們已經看到，(註一)俄羅斯生產的數量已達到了戰前的水準，但因為鑄鐵生產的落於一般工業發展之後，現在就成了一個很重大的障礙了。根據在共產黨第十五次大會中所提出的材料，一九二七年末，鑄鐵生產僅及戰前的百分之七十一。情形後來沒有多大的改善。這就是一種「鑄鐵荒」的所以成爲現在俄羅斯工業的一個最嚴重的問題。並且，一般工業生產的成本都

仍很高，結果就使物價極大的騰貴。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工業生產批發價的平均指數比之一九一三年高出了百分之八七。

蘇維埃政府不承認牠自己的主義須對現時許多工業制度的缺陷負責。相反他們的領袖反別求解釋的原因，最習見的是歸因於實在的或假定的現政體的敵人中的若干不逞之徒。

因之，在一九二八年春，蘇維埃政府就把南俄頓尼次流域煤礦的若干工程師，加以審判。這些工程師被控怠工，意圖阻礙煤的開墾。

在這次的審訊中，發現了有些人的處置失當和缺乏效率，但這些罪狀並不含有傾覆蘇維埃經濟制度的任何有組織運動的意思。可是在一九二八年七月五日，有十一個被告被法庭判決了死刑，五個人即處死了，其餘六人的死刑減為十年有期徒刑。

審判的結果卻反乎蘇維埃政府的期望。隨着不但煤礦的生產沒有增加反是確實的低減了，並且這種情形，也發現於許多的別的工業生產之中。工業生產的低減，是頓尼次流域工程師審訊後，結果使工人的紀律失墮所造成的。許多工人藉口工程師怠工反對政府，逐漸的對工廠管理加

以批評，在另一方面，許多工程師就給這次的審訊喪了膽，謹慎地不願發布有利工廠而失歡工人的命令。

如果俄羅斯工業情形依舊反常，農業情形則更加惡劣。因為政府所規定的穀物價格太低，農民就改種別種穀物，以及從事飼養牲畜及酪坊業。農民不願把穀物賣給政府，甚之即在他們是很豐富的供給亦然，他們寧願違法地把穀造成酒醇。

穀物的不足見於俄羅斯對外貿易的報告中。一九二六——二七財政年的最初十一個月中，有二、五〇七、〇〇〇噸的穀物——約值一二、〇〇〇、〇〇〇元——從俄羅斯輸出了歐洲的邊境。同時期在一九二七——二八年中出口的祇有五四四、〇〇〇噸，約值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了。（註二）

一九二八年春，蘇維埃政府向「富農」採用了強迫徵收穀物的手段。這手段引起了農民對於當局的極大的反感。

政府現在計劃着建築新的國有大農場，採用最新式的機械，造成經濟的獨立，不必倚賴於農

民約有一千五百萬畝的土地，就指定改爲國有的農場或政府的「穀物工廠」——主要的是在伏爾加流域，北部高加索，西伯利亞，以及喀山吉斯登（Kazakhstan）。這種徹底的計劃在將來是否能夠實現，現在仍是一個問題。但無論如何，他們不會給與蘇維埃政府以即時的救濟。

蘇維埃政府在這時可以用爲解決他的困難的唯一的方法，似乎只有在俄羅斯經濟制度中實行某種程度的「資產階級」的改革。

但這個方法爲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會所排斥了。委員會拒絕這個改革的提案，並指提案的建議者爲「右傾反對派」，並恫嚇以前一年「左傾反對派」所受的一樣命運。

放棄了由國內經濟改革而取得資本，蘇維埃政府現在希望由借款或給予讓子從外國得到資本。一九二八年秋莫斯科宣布了一個迅速發展和增加對外讓子的政策。

但蘇維埃政府究竟能否從外國取得必需的資本，這是一個疑問。牠的財政所需是很大的。牠的支出近年歷有增加，在一九二五——二六財政年中的國家豫算已達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元，一九二七——二八年更超出了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豫算表中主要項目的工業津貼費也增加了一九二五——二六年時計有三七一、〇〇〇、〇〇〇元用於新建築及工業設備計劃之上。在一九二七——二八年，增加到了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以後五年內，蘇維埃政府經濟計劃中需要的津貼工業費用不下於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國內的債務在蘇維埃經濟制度中祇能供給這必需的總數中很小的一部。

同時，不能得到這筆款項，將成爲俄羅斯工業的一個大缺陷。工業生產如果不敷人民的需要，政府就免不了發生嚴重的糾紛，尤其在對付農民時，政府必須以製造品交換農產品。製造品的供給不足，就不啻交換的穀物減少，國課收入減低，經營國有工業的資財更爲薄弱。因之，俄國現在情形的嚴重性是不可否認的。蘇維埃政府可以把最後解決展緩若干時，但到了那時就會嫌太遲了，好比一九二一——二二年的災荒那類的不幸事件。

(註一) 參看前面第十七章第六節。

(註二) 蘇維埃政府想以其他農產品代替穀物的出口，如牛酪、雞蛋，及肉。在一九二六年——二七財政年的最初十一

月中穀物外農產品出口總數約計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元，同時期在一九二七——二八年的約計一五三、五〇〇、〇〇〇元。

附錄一

一 蘇維埃俄羅斯之學術與教育

共產黨革命深深地影響了俄羅斯的學術和教育。在內戰及「戰時共產主義」的時候（一九一七——二一年）普遍的生活的崩潰，對於教育也不能免去了不幸的反響。一個最嚴重的因素，是許多教師和有學問的人，經過了多年半饑餓的狀態都死去了。在這幾年中，蘇俄有若干最著名的俄羅斯學者，單純地因飢餓而死了。其餘的許多人就由美國賑濟會以及其他外國慈善組織所贍養。新經濟政策之後，一般智識階級人物，尤其是教師及學者境遇有了極大的改進。

科學機關及公衆教育的組織皆由蘇維埃政府加以極大的更改。整個教育的過程加上了一種政治上的色彩。根據蘇維埃領袖的意思，學校必須推進或者至少不能與共產主義及唯物主義

的理想違反。整個的教育，尤其是社會及歷史科學的教授，都歸政府所統制。許多不同意史的唯物學的學者，就都被剝奪了教授的權利，或被放逐於國外。

在莫斯科就組織成了許多純粹馬克思主義的學術中心，其中如一九二〇年成立的馬克思與恩格爾社 (Institute of Marx and Engels) 及一九一八年成立的共產主義學院 (The Communist Academy) 在舊有的學術組織中，列寧格勒的科學研究院是繼續工作，最爲成功，甚之還擴張了牠的活動。牠的名字在一九一五年改爲『全聯邦科學研究院』 (All Union Academy of Science)。在基夫成立了一九一八年斯加洛巴斯基統治時一個烏克蘭科學研究院。

大學的性質就發生了極大的改變。他們的自治由蘇維埃政府取消了，並把他們交給了共產黨官吏去管理。法律、歷史、哲學的學科經過了改組，它們的綱領大大的狹窄了。新的有利於工人的學科 (Rabfad) 採用了。並且『無產者出身』的學生有特進入大學的優先權利。資產階級出身的人物以及教士的兒女，都受限制或完全不准進入大學。高等教育學校中學生的人數爲一六八

、〇〇〇人中等及初等學校是一個單一統系制的二支。學生的人數比戰前僅略有增加。在一九二五——二六年，初等學生人數八百萬人，比一九一三年增加了一百萬人。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蘇維埃教育委員長盧那卻爾斯基在共產黨第十五次大會中報告蘇維埃在初等教育方面祇達到了戰前的水準。盧那卻爾斯基復說，約有百分之二十五熱望就學的孩子，因為缺乏學校而被拒絕入學。根據盧那卻爾斯基，自從一九二五——二六年後每年開辦的新學校的百分率表示出很快的低落，他表示恐怕至一九二八年新學校的開辦將完全停止。

在蘇維埃政體下的一個極大的發展，是減少文盲的成人教育。在一九二五——二六年時，約有五〇、〇〇〇個為成年文盲而設的學校，有學生一、六〇〇、〇〇〇人。（註一）但成年文盲在俄羅斯並沒有完全消滅。蘇維埃領袖計劃在舉行第十一週紀念時可以完全消滅文盲，但這個計劃是失敗了。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數字，顯示出俄羅斯文盲的男子佔百分之四十三，女子佔百分之六十五。

二 蘇維埃之教會

由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的法令，蘇維埃政府把國家與教會隔離了。這法令准許國民屬於任何教會或不屬於任何教會。但教會組織的活動，因為他們被否認爲法人和不能置產的事實就受了極大的妨礙。所有的教堂建築都被認爲地方蘇維埃的產業，可以——但不必——准許他們作爲宗教團體之用。並且，在法律的明文和確實的施行之間有極大的差別。共產黨由主義的立場反對宗教和教會。反對宗教主要直接對抗國教教會，因爲革命運動者把這種教會看成爲一種前政府的制度。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國教教會因在帝制政府之下沒有自由和獨立受了許多的苦痛，雖然在另一方面，牠比之其他教會居於特權的地位。

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後，俄羅斯國教教會召集了一次會議。這次會議承認了重新確立彼得大帝所撤消了的教長的必要，這樣纔可以重新得到不受國家干涉的以前的教會獨立。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布爾塞維克革命的幾天之後，會議選出了總主教鐵康（Tikhon）爲教長。新教長在最難

堪的情況下工作着。當時政府並未正式禁止宗教生活，但許多地方蘇維埃已開始迫害教士代表的運動。在一九一七——二〇年的進程中，有一千多監教牧師，僧侶被鎗殺或因監禁和飢餓而死了。蘇維埃政府並未干涉鐵康教長，雖然他曾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九日公布了一個嚴重申斥政府所採措施的宣言。

一九二二年春，蘇維埃政府頒佈了一條命令批准了徵收教堂財庫，藉口用為救濟災荒的工作。教堂財庫的劫奪，聯着一個新的迫害的波動。有好幾百牧師就被逮捕，其中許多人被鎗殺了，彼得格勒的監教范尼敏（Veniamin）也是其中的一個。教長鐵康被幽禁了在莫斯科的一個清道院裏。

同時，蘇維埃政府想扶助主張劇烈改革教會組織的一部分牧師，以引起國教教會內部的崩解。一九二三年春，這一部人召集了一個一部分的國教僧侶私俗人代表的集會，自稱為是一個合法的國教教會的會議。（註二）會議遺責鐵康教長的反革命觀念，剝奪了他的位置。但他不久被蘇維埃政府釋放了。大部分的教友繼續認他是教長，直至他去世為止，一九二五年四月七日。

鐵康教長死後，他的下屬總主教彼得就成了教會的領袖。他也給蘇維埃政府禁錮了，由總主教薩琪（Metropolitan Serge）保守了教長的位置，他在一九二七年夏與蘇維埃政府訂結了一個協定，宣告效忠於蘇維埃國家。

國教教會和蘇維埃政府的將來關係，是無從預斷的。現時祇能說，國教教會表示了他在俄羅斯比帝制政體更富於活力。

（註一）這種學校在歐戰之前，便存在了，但差不多限於城市。

（註二）這是『第二次會議』第一次於一九一七——一八年舉行。

附錄二

俄羅斯人國外之逃亡

俄羅斯的共產黨革命及內戰，隨着發生了一個大量的人民的向外遷徙。差不多所有活着的反布爾塞維克政府的官吏以及反布爾塞維克軍隊的軍官和兵士，都帶了他們的家族移到了國外。移居於各國的總數達一百萬人。他們分布在五十個不同的國家之內。居於法國的人數最多，在四十萬以上，次爲德國，計十五萬，波蘭，九萬（註一）中國八萬；南斯拉夫三萬五千；捷克斯拉伐克，三萬；保加利亞，二萬五千。

俄羅斯逃亡者中有一大部分爲智識分子及上流階級的人物。也有好幾萬是哥薩克人。差不多他們都喪失了在俄羅斯的全部財產，在外國他們就毫無辦法。有許多的俄羅斯逃亡者都是不

能工作的，他們是戰爭的殘廢人，老年者，或病人，他們大部人的境況都是十分的不穩定。大部分的俄羅斯人，包括智識分子，都在工廠或礦山中或是農場上用手工勞力維持着生計。俄羅斯勞工在各不同國家中的平均工資，因各地情形的差異而有不同。在法國——那裏大部的俄羅斯人找着了他們的工作——平均收入約每月三十元。只有很少數的人得能重操他們的舊業。

有些歐洲國家的政府，尤其是斯拉夫族的國家，在教育上幫助着俄羅斯逃亡者。由他們的幫助，約有二萬二千人在外國完成了他們的高等教育。捷克斯拉伐克政府更以獎金給與了一部分逃亡於該國的俄羅斯的學者。（註二）

俄羅斯在外國的教授，更爲俄羅斯學生組織了若干大學——在普拉格和哈爾濱的法律學校以及普拉格的一所農業合作學院（Agricultural-Co-operative Institute）。俄羅斯鄉鎮及城市委員會的殘餘分子，利用存留在外國的大使館的餘款，和得到美國的慈善性的捐助，爲俄羅斯旅外的孩子設立了許多普通學校和高等學校。一九二六年——二七年鄉鎮和城市委員會在歐洲國家裏維持着八十所學校，有學生四、〇二三人。

俄羅斯逃亡者處於一種完全沒有法律保障的地位中。他們沒有通常的護照，因之不能有行動的自由。許多國家拒絕他們的入境。一九二一年國際聯邦從事於照顧俄羅斯逃亡者的工作，——委任了南森博士(Dr. F. Nansen)為特任委員。日內瓦的國際勞工局(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也參加了救濟俄國流民的工作。至於俄羅斯流民的物質救濟和居留處所，以及他們的法律地位等問題，至今卻還不曾解決。

(註一) 此數僅包括俄羅斯的避難者，沒有把在波蘭的俄羅斯人包括在內。俄羅斯領土一部分歸併波蘭之後，在波蘭的俄羅斯人達四百萬人。

(註二) 南斯拉夫及保加利亞的政府邀請了許多俄羅斯逃亡的教授，任職於南斯拉夫及保加利亞的各大學中。

